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庄福龄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本 卷 作 者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康祥生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唐元棣

目　录

第十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692)
一、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热潮……………(692)
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及其广泛影响……………………………………………………(699)
三、在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制定战略策略……………………………………(705)
四、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714)
五、批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唯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阵地……………………………………(720)

●第二节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对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理论的贡献……………………………（728）
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必然性和特点
……………………………………………………（729）
二、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739）
三、社会主义国有化和阶级消灭理论的新发展………（747）

●第三节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
……………………………………………………（755）
一、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著作……………………………………（756）
二、正确分析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提出解决矛盾的"兼顾两头"的原则……………………（758）
三、正确分析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提出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762）
四、正确分析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揭示社会主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特点……………………（764）
五、正确分析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发展内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769）

●第四节 党的八大文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哲学思想……………………（775）
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776）
二、"既积极又稳妥可靠"建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778）
三、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783）
四、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787）

第十三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伟大贡献………………（794）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著作…………………………………………（795）
二、批判“无矛盾论”，阐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797）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799）
四、第一次明确提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804）
五、科学阐明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811）
●第二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破坏和党中央毛泽东对错误的反思……………………………………（824）
一、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824）
二、对主观主义错误的初步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830）
三、彭德怀、张闻天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840）
四、倡导学习马列著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845）

●第三节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854)
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855)
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863)
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871)
四、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877)
五、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发展……………………(881)
●第四节　主观主义错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892)
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以及对不同观点的错误批判…………………………………………(892)
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以及对不同观点的错误批判…………………………………………(895)

第十四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一节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903)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904)
二、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909)
●第二节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作出新论断…………(917)
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918)

二、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920）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的阶级斗争……………（924）
四、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根本前提……………………………………………（929）

●第三节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934）
一、《决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的典范…………………………………………………（935）
二、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作出科学评价…………………………………………（940）
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
作出全面阐述和新的概括…………………………（947）
四、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956）

第十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一节 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960）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结长期历史
经验的基本结论………………………………………（961）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
关系……………………………………………………（962）
三、揭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971）
四、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977）
五、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981）

●第二节　在改革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989）
一、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990）
二、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哲学启示…………（995）
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哲学意义……………………………………………（1003）
四、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1019）
五、根据全面改革的要求，进一步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103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大趋势…………………（1044）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1044）
二、革命发展问题上可以逾越和不可逾越的历史辩证法………………………………………………（1047）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
……………………………………………………（1051）
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争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胜利……（1057）

后　　记……………………………………………（1062）

第十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领导我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实践中得到多方面发展。特别是在巩固人民政权、反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发展了经济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建国以后，党的根本任务是迅速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有步骤地把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为了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党面临着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学习、宣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过去的"非法"地位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公开地、有计划地阅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并不会随着剥削制度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它从旧社会遗留下来，腐蚀着新社会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宣传和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人们的工作，自觉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热潮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提高全党和全体人民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考虑建国后干部和群众的理论学习问题。毛泽东总结延安整风期间曾经规定"干部必读"的作法和经验，重新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共十二本，并被七届二中全会所认定。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要以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开展广泛的职工教育，开始着重于工人。""要趁热打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象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工作。"①朱德也非常强调干部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他在1949年4月10日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学习应由两方面进行。一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种学习是很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二是理论学习，这种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学习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的干部在理论学习方面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名言。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学习理论就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②建国后不久，1951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2—423页。

②《朱德选集》，第259—260页。

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要作出计划，组织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①毛泽东还曾找过一些领导同志谈话，要求他们读点哲学书，学点辩证法、唯物论，也要学点逻辑。他恳切地说：你们犯错误，总是说由于工作忙，这样说，不对！俄国十月革命时，列宁不是很忙吗？可是，列宁还是把那个错综复杂的俄国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你们犯错误，是由于缺乏一个贯穿一切的东西。1921年我们党成立以来，轰轰烈烈地干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幼年的党由于缺乏经验也犯了不少错误。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学习哲学正是为了掌握这个相一致的道理。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强调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符合建国初期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理论方面的实际情况。当时，我们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知识水平是很低的。一方面，过去广大地区和主要城市是处在国民党黑暗反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145页。

②参见《红旗》杂志1981年第13期。

动统治之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死罪。解放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对此毫无所知。而旧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动的宣传却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解放区是长期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马列主义的学习受着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许多干部虽然在斗争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发展是那样迅速，而我们的理论是如此缺乏。很多人对于国际国内的现状不很了解，甚至保留着错误的或反动的看法。对于中国革命的各种纲领政策不善于领会，甚至在各种问题上抱怀疑的态度，对于个人的生活、前途方面也往往有许多问题想不通。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李达分析了当时干部的工作、思想情况，认为干部迫切需要学习哲学。他说："在我们干部中，有些犯了官僚主义的偏向，自己坐在办公室里订计划制表格，以此为满足，而不深入群众，不去检查。有些人犯事务主义的毛病，对主管工作掌握不住中心，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整天忙忙碌碌，可说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还有些人犯'左'倾急性病，也有些人犯右倾慢性病。无论是哪种错误，对革命工作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损失；这些错误的根源，基本上是主观主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又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这两方面相结合，就形成了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这次学习运动是以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为中心内容的。

广大哲学工作者走在学习运动的前列。建国前夕，在党的

领导下，由全国各地哲学工作者发起组织的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于1949年7月8日在北平召开了发起人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哲学会的意义是“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和传播马列主义哲学及毛泽东思想，以期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展开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①中国哲学会成立后，哲学工作者立即投入学习和宣传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活动。1949年9月，艾思奇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的文章，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范围的完全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难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的大城市，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高涨。目前学习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要求经过这一学习，较有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期间，许多哲学工作者到干部学校、高等院校宣讲历史唯物论。艾思奇1949年下半年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等单位宣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他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于1950年4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经过修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以后，该书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又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放社编的《社会发展简史》一起被列为各单位学习的主要教材。此外，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马特的《哲学初级研究提纲》、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莫迺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等著作以及哲学工作者撰

①《光明日报》1949年7月13日。

写的大量论文，对当时的学习活动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积极投入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他们深知，自己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只有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出色地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同时，他们学习的好坏，对全党的理论学习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高、中级干部对理论学习都抓得很紧。学习的方式除了独立自修以外，一个重要途径是进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集中学习。学习的内容是马列的有关哲学著作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马列学院当时的教学方针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后来改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根据这一方针，马列学院的教员和学员刻苦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着重在掌握基本原理上下功夫，并且运用基本原理说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运用基本原理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马列学院的学员通过系统学习，破除了对哲学的神秘感，提高了学习哲学的兴趣，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马列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经验总结在《学习》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许多单位的学习。这个经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苏联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专门组织讨论，教研室主任格列则尔曼教授在给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信中说：中国哲学教学的经验“是大有教益的”，“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的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

究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看法，正是这条道路才能够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有机联系开辟了最宽广的可能性。”①

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也形成了热潮。解放初期，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课，学习方法是自学为主，讨论为辅，教员从旁协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哲学工作者到各大学讲课。艾思奇在北京大学对第一堂政治课作辅导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学习它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世界；来正确的研究问题并解决问题。”他还说："我们不能太轻率的看马列主义，下决心学习它，需要一生不断的学，立场、观点、方法，三个东西是要学习一生的。它们是具体解决问题的。你们利用它解决了一个问题，你就在此问题上掌握了马列主义，但你遇到第二个问题时，你又要重新学。马列主义不是一个死的公式，而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些讲话使师生受到很大的启发。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肃清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从而逐步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工人中也广泛开展了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活动。各地普遍采用办训练班的形式。北京市委1949年下半年连续举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其中第三期的教育对象，以北京市各较大公营企业的工人为主，经过比较系统的历史唯物论的

①《学习》杂志1955年第10期。

教育，使工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孙定国主笔的《北京市委干训班教学工作总结》中说："我们认为对工人阶级普遍的比较系统的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工人阶级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其理解程度，确比一般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更快更好。他们对这种理论，最少怀疑，最少抵抗，相反的，他们是非常热烈甚至是'贪婪'的去接受的。"①

总之，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热潮。通过学习，许多人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理论，提高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上的基础。

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及其广泛影响

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推动正在兴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就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具体工作。1951年10月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和1953年10月又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毛泽东选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许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

---

①《学习》杂志1949年12月第1卷第4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特别是最重要的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实践论》是建国后重新发表的第一篇毛泽东的旧作，它先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于1950年12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社论阐述了《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和不朽价值，指出："毛泽东同志这个战斗的著作，完善地分析了认识运动或认识过程的规律，是一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的逻辑科学，是中国工人阶级长期战斗在思想上的结晶品，是中国哲学界一个全新的革命。""这个著作不只是为某些少数人而写出的，而是为一般的人而写出的；虽然是在十几年前写出的，但是它的意义乃是普遍性的、永久性的。它对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同样地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我们现代的人和将来世代的人都将不断地从这个杰出的著作中吸取明晰的智慧。"《学习》杂志在1951年1月16日出版的第3卷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的社论，阐述了重新发表《实践论》的现实意义。社论指出："这篇论文，系统地发挥了，并且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它对于今天在全国各地从事保卫和建设我们国家的人们，以及一切参加各种研究工作和政治学习的人们，是一个富有指导意义的文献。任何人如果愿意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愿意努力正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把工作做好，就应该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文，就应该努力用《实践论》作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指

南。”

《矛盾论》重新发表于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列为首篇。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专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介绍》，其中特别介绍了《矛盾论》，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这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文献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极其深刻地阐述了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的对立统一法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着重地阐述了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严厉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那种主观的、片面的与表面的错误思想方法。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重要贡献。”1952年4月出版的《学习》杂志第四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强调学习《矛盾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指出：《矛盾论》教导我们怎样观察与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怎样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注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在实际工作上和理论研究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这是党的思想工作中的经常的斗争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十五年前的著作《矛盾论》的重新发表，提供给我们进行各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的武器。”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充分肯定“两论”发表的伟大意义；很多单位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经验交流会。广大干部和群众把“两论”当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当作指导工作和生活的行动指南。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活动进一步向深入发展。

“两论”的重新发表，在哲学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在学习、宣传“两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达精心撰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本书，为力求精粹准确，他写完一部分就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和他相互通信交换意见。在看完《〈实践论〉解说》第一、二部分后，于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写信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又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① 在撰写《〈矛盾论〉解说》时，毛泽东也写信给李达提了具体意见。李达的两本《解说》不是单纯的注释读物，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独立研究的成果。不仅做到了通俗生动，而且准确深刻。例如，作者在论述中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力求讲清毛泽东的基本观点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根据，讲清毛泽东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而对这些原理作了补充和发挥；反复强调“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标准”，“我们是为实践而学习《实践论》，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实践论》”。这些论述都是很精辟的。两本《解说》对进一步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起了重要作用，为哲学通俗化的工作做出了榜样，这是我国解放初期哲学界的新收获。

艾思奇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他讲了大量的哲学课程，写了许多文章。1950年发表了《毛泽东同志

---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2年又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等。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但是要坚决反对在没有弄清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并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出版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苏联，《实践论》的发表早于我国《人民日报》，它是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发表的，并很快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单行本。《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2年第8、9期刊登了《矛盾论》。“两论”受到苏联人民热烈欢迎。《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说，广大苏联学者“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苏联学者在《真理报》、《共产党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评介《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高度评价“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①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也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①转引自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苏联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著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财富。伏尔科夫在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文章指出：《实践论》“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列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①

朝鲜《人民》杂志于1952年7月号全文发表了《矛盾论》，朝鲜劳动党于1953年出版了《矛盾论》朝鲜文单行本。党的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哲学论文中，对观念论和教条主义思想作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同时还适当而丰富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的基本命题，并与历史事实相适应地发展了它。……我们透彻地学习概括着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矛盾论》，对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进一步促进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②

英国人民十分重视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谢尔基尔克在其撰写的《读〈实践论〉》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对英国共产党也是有指导意义的。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于1951年11月出版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一书。后来在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后，受到启发，在1956年出版的俄文本中，他充分吸收了《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在书中直接引《实践论》的地方有十二

①转引自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②转引自1953年5月22日《光明日报》。

处，引《矛盾论》的地方有九处。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完备的探讨。

在日本，50年代初期就有了《毛泽东选集》各卷和一些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译本。这些书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宣传介绍性质的著述，并有一些学者开始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例如，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1952年9、10、12月号上发表《论毛泽东的哲学意义》一文，文章指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践，并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而且还具有国际意义。”松村一人在1954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发展》一书，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总之，随着《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和被译成各国文字，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逐步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在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制定战略策略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复杂的形势和巨大的困难，从经济上说，工农业生产落后并遭到严重破坏，交通阻塞，商业停滞，市场混乱，财经极端困难。从政治上说，国民党反动派还盘踞着西南、华南的某些省份和台湾一些沿海岛屿，潜伏下来的土匪、特务和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封建势力仍然严重存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没有消除，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它在我国的失败，出兵朝鲜，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且在经济上对我国

实行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实践证明，我们成功地克服了困难，政权很巩固，生产恢复得很快，没有出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革命后生产一度下降，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这些战略策略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第一，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四面出击。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得到了解放，绝大多数人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但是问题还很多。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建国后阶级斗争的形势。他指出：“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①在我们的基本群众中，失业工人有不满情绪；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由于社会经济改组，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此外，失业知识分子和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总之，我们不仅面临着够大够多的敌人，而且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工农基本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很多必须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呢？毛泽东规定的指导思想是：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四面出击。那么，应当怎样认识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呢？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页。

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②从这两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主要矛盾的转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二是打倒地主阶级，土地改革完成。建国初期，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第二个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据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攻击目标，"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③具体地说，对外，就是要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对内，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的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打击主要敌人，就要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毛泽东说："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④为此，要做许多工作。例如，通过土地改革，消除农民的意见，使工农联盟巩固起来；通过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对小手工业者，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页。

要安排他们，给他们找出路；对知识分子，要安排使用，同时对他们教育和改造。总之，就是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同主要的敌人作斗争。

按照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毛泽东特别强调正确处理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要被打倒的阶级。但毛泽东根据我国的情况，提出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他说："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①建国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所以，既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尽可能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又要限制他们消极的一面；既要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在经济上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又要对其政治上的错误主张和经济上的反限制进行必要的斗争。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不是说不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②"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③

总之，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当时的主要敌人。对此，毛泽东做了精辟的概括："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

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①

第二，政治斗争与发展生产有机结合。

建国初期，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工作十分繁重。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二是开展一系列政治斗争，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等。那么，这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党应当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②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③1950年6月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④

为什么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呢？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页。

首先，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先于经济基础而建立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以后，就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必须由国家尽快地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否则就不能存在下去。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①

其次，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应该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②

再次，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建国初期的当务之急。由于经济落后和长期战争，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刘少奇说："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于我们过去在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困难主要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③只有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重点，花大气力，才能渡过难关，为其他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页。

切工作打下基础，并且粉碎帝国主义者污蔑中国共产党不会搞经济建设的无耻谰言。

党在坚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既讲了政治，又讲了经济，既讲了革命，又讲了生产，但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革命是为生产服务的，这就坚持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党把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土改的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①所以，土改的每一步骤，都紧密结合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来进行。中央指示要不误农时，"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要"争取今年丰收"等等②，这些都体现了土地改革同恢复和发展生产相结合的思想。

总之，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把各种政治斗争同恢复和发展生产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二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开展各种政治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通过各种政治斗争特别是"五大运动"，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政治斗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束缚，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政治斗争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和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见1950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35页。

可靠的政治保证。

第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制定政策策略的典范。

首先，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人民解放军进藏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局面：西藏远离内地，地广人少，交通十分不便，我进藏部队存在严重的补给问题；西藏当时保存着最残酷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大农奴主的反革命政权，保留着反动武装；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势力还存在，在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集团中还占优势。毛泽东指出，总的力量对比是：在军事力量方面西藏的反动派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这种情况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阻挠和破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施，企图永久保存反动的农奴制度，也是西藏反动派敢于对抗中央并向我们示威的原因。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解决西藏问题，全部实施协议的根本保证。

如何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呢？毛泽东着眼于生产，着眼于群众，着眼于自立更生。他说：“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① 解决了生产和贸易问题，我们就有了站稳脚跟的物质基础；解决了藏民的生活问题，我们就有了站稳脚跟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1—62页。

的群众基础。毛泽东的深刻论述，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延缓协议的全部实行和改编藏军的斗争策略。由于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的时间很短，还来不及做到生产自给，藏族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了解，我们对上层分子的工作也还有待继续进行，因而在策略上毛泽东制定了延缓协议的全部实行以待时机成熟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①协议必须全部实施，西藏人民必须解放，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性。但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在策略上应当采取灵活的方式。如果离开西藏的实际情况，不顾客观条件，想立即全部实行协议，不仅办不到，而且会走弯路、犯错误。只有暂缓执行协议，等到一年两年以后，我们站稳了脚跟，有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和上层基础，那时就有了全部实行协议的可靠保证。这样看起来慢了，实际上还快些。对1952年春天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拉萨向我驻藏代表示威请愿事件的处理，毛泽东说："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②进攻——让步——进攻，表明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西藏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但经历的途径必然是曲折的。我们在形式上采取攻势，批评西藏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4页。

反动势力破坏协定，这是原则性，但这种批评是为了在事实上主动的让步；这种让步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以退为进、以慢求快，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进攻即全面实行协定，把西藏人民引向社会主义。这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四、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这个新课题，不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只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创造。同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条件变了，地位变了，很容易使一些人以胜利者自居，居功骄傲，脱离群众，滋长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所以，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整个时期，党和毛泽东始终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以端正思想路线，清除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主观主义的表现有了新的特点。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说："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对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① 可见，急躁冒进或保守，就是主观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表现形式。如果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处理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4—95页。

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那么，急躁冒进和保守则主要是在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在客观规律面前，思想懒汉，消极悲观，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去做，本来可以争取的胜利也不去争取，这种坐失良机的保守思想显然是使自己的主观指导脱离了客观实际，这是一种主观主义。而无视客观规律，单凭主观热情，鲁莽蛮干，超越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勉强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样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反对主观主义，既要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①

毛泽东是从哲学高度反对主观主义的，他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对立，认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②“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的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③主观主义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与此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认识和实践相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④在这里，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

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4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297、297页。

路线呢？

毛泽东认为，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首先要学习，特别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①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才能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在实践中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提倡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学习哲学。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几十万字一本的书。"②"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按辩证法办事。"③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④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一般理论基础。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掌握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⑤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克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锐利的思

---

①②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145、362、145、145页。

想武器。毛泽东指出，为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要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要“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①毛泽东认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是主观主义的认识根源之一，要克服这种片面性，就要学习唯物辩证法。毛泽东说：“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②

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③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来自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它对各个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马列主义不能概括各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不能提供解决各国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对马列主义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把它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寻找适合我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如果只会照搬照抄马列主义的词句，那不但不能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还会陷入新的教条主义的泥坑，把革命引向失败。毛泽东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说：“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④他对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说：“我奉劝诸位，

---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415、286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页。

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①

毛泽东认为，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除了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外，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建国后的七年工作中，我们党曾犯过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一些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办公室里，用空想代替调查，用感情代替政策，而不愿深入下层，倾听群众的呼声，总结群众实践的新鲜经验。毛泽东指出：“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只能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各种必要的材料，弄清问题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调查研究是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桥梁，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党的历史上，党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但主观主义并没有绝种。毛泽东说：“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③这是因为，主观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

首先，从社会根源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基础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7、91、297页。

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所构成的。由于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是小私有者，在政治上有革命性和动摇性两个方面，在思想上表现为片面性、绝对化，因而容易忽“左”忽右，好走极端；又由于其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往往“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因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①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小生产得到了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主观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已经不再存在了。由于我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思想源远流长，资产阶级思想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传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会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起作用，成为滋长主观主义的土壤和温床。

其次，从认识根源来说。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绝对化，是产生主观主义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如果只相信理性认识而否认感性认识，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如果只相信感性认识而否认理性认识，就会陷入经验主义。再从客观事物本身来说，物质世界是充满矛盾、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过程。如果片面地看问题，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事物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或者外部表现，夸大为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那就必然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从而陷入主观主义。即使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到了共产主义，产生主观主义的社会根源不存在了，但认识根源仍然存在。因此，反对主观主义是长期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时，某些论断不尽符合事实。例如，1955年上半年围绕合作化发展速度等问题进行的争论，是在目标和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产生的不同看法，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从夏季以后，毛泽东却把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和其他同志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正确见解，看作是右倾保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

五、批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唯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阵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战斗的科学，它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传播和发展的。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在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它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在积极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动的同时，党和毛泽东十分注意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动向，积极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对电影《武训传》中的唯心史观的批判，一是对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拍摄于1949年到1950年，1950年底和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演。影片中的武训，毕生行乞，兴办“义学”，受压迫而不抗争，受侮辱而不怨恨，以牛马自居。影片歌颂武训的行为，说他是“至仁至勇”的千古英雄，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中华民族崇高品质的代表。影片

放映后，开始是一片赞扬声，一个月内，报纸上就发表了四、五十篇颂扬《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1951年3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的一篇批评文章，于是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

文化界的这场讨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毛泽东用唯物史观对电影《武训传》及其赞扬者进行了尖锐批评。第一，不应当歌颂武训的丑恶行为。毛泽东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扬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①武训生活的年代，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人民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主流。武训却远离农民革命洪流，走上一条向地主阶级妥协求乞的道路，这只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不切实际的幻想，麻痹和瓦解他们的斗志。所以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歌颂的。第二，不应当模糊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在政治上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只有人民的革命斗争，才是中国人民取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但在电影《武训传》中，人民革命斗争却被描绘成武训"英雄事业"的陪衬，起义的农民被描绘成只知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页。

烧杀的乌合之众。这种电影却受到一些人的赞扬。对于这种唯心史观，毛泽东批评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①他要求人们研究近代史，分清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什么是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什么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从而划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第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员面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放弃了唯物史观的立场，丧失了批判能力，因此应当实实在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号召，应当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同一天，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这样，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分别발出有关指示；文艺界、教育界分别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各地报纸杂志发表了批判文章；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和有关同志参加了讨论，有的作了自我批评。8月，讨论基本结束。

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了革命思想，批评了改良主义，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解放道路，有利于巩固刚刚取得的历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47页。

史性胜利。其次，对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了推动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再次，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第一，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批评过于严厉，语言过于激烈，涉及的人也比较多。第二，这场讨论后来实际上变成了政治批判。有的批评文章简单粗暴，无限上纲，指责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上，进行反动宣传；有的文章追究电影编导的政治目的，把电影同反对土改联系起来，说它是向新中国的挑战。第三，在方法上，是一哄而起，围而攻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严重混淆了艺术问题、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了一个进行错误批判的先例。

继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54年至1955年间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它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歌颂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红楼梦》问世后，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少人对它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红学"。

本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等批评"旧红学"，建立"新红学"。他们的主要工作，一是对《红楼梦》作者的考

证；二是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三是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个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后一方面虽有合理因素，但其严重缺点是研究中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对后来的“红学”产生很深的影响，长时间占统治地位。

俞平伯是著名的红学家，他在《红楼梦》版本的校刊考证和对作者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研究，坚持的是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思想。1952年9月，俞平伯把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重新编订，收入新作，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3月，《新建设》又发表了他的《红楼梦简论》。这些著作，虽有可取之处，但基本思想承袭了胡适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1954年9月，从山东大学毕业不久的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同年10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第一，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记录作者自身情场经历的真实人物的“写生”，作者创作《红楼梦》是为了使人“破闷”、“消愁”，等等，这就忽视和否定了《红楼梦》一书的现实意义。第二，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风格是“怨而不怒”，是“一面公平的镜子”，没有褒贬倾向，这就忽视和否定了《红楼梦》强烈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第三，俞平伯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源本西厢”，是一本平淡无奇之作，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就忽视和贬低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第四，俞平伯以繁琐的考证代替了科学的分析，不仅对《红楼梦》的研究得不出正确结论，还会引导青年研究者走入

迷途。

毛泽东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批评了某些“大人物”阻拦发表“小人物的文章”的错误态度，高度评价了李、蓝的文章，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①号召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②毛泽东还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③

在毛泽东的倡导与支持下，一场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多次开会讨论，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艺团体也纷纷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事实上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从1954年12月开始，这种讨论和批判扩大为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斗争。为了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许多省市相继成立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这场批判涉及到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3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多次联合召开胡适思想讨论会，其中哲学方面的就有八次。到1955年8月底，各地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200多篇，并出版了一批书藉。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5页。

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建国初期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通过这次批判，打破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使《红楼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清除古典文学和整个学术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影响，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这场批判中，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哲学工作者，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观、发展观、方法论以及实用主义的反动实质，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对于清除唯心主义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影响，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建立无产阶级理论队伍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批判，也存在缺点。主要表现在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简单粗暴，片面性、绝对化，对胡适其人也缺少具体分析。

为了及时总结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经验，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指示》说明了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对于打退敌人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在广大群众、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都有很深的影响。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以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

《指示》提出了在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时应当遵循的具有

普遍意义的原则。主要有：第一，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应当坚持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著名的学术工作者还是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应当平等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第二，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批评和反批评，容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第三，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要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批判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唯心主义思想，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第四，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要注意政策，要严格区分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和政治上反动的界限。对于学术上有严重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给他们安排适当工作，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讨论，实行自我改造。

《指示》特别强调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指出：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组成这样一支理论队伍，要有党内学术工作者，也要有党外的学术工作者，还要包括那些思想上得到了改造的旧的学术工作者，尤其要注意培养学术界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指示》强调指出，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判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

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

《指示》发出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发展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轮训全党的干部；在城市中建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加强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报纸、广播、刊物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出版社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全国出现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热潮。

由于历史条件和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指示》的一些正确意见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个文件对建国初期几次思想斗争存在的问题缺少必要的总结，对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也未能指出它的弊端。《指示》提出对学术讨论中的问题应作出结论，这也是对学术思想争鸣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的表现。

第二节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1952年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分散、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同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之间，以及私营经济内部劳资之间等方面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了。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必然性和特点

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后，党和毛泽东于1952年底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制定，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全面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早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指出我们的国家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具体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前途和趋势。他分析了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分析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规定了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即“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分析了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规定了“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政策，指出“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①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胜利，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1953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给中央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基本内容。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1322页。

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①

随后，毛泽东在审批一些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时，对总路线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将"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国家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使总路线的内容不断完善、精确。

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宣传总路线，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28日，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两次修改过的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②

毛泽东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①就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②这就说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党和毛泽东在一系列文件、著作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特点。

第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新民主主义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1875年著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③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④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我国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因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在那些国家，是无产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我们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说，是先建立新民主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illegible]、4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62页。

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

那么，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不是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毛泽东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理，明确回答："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②以为中国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只是幻想。首先，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政权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允许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其次，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帝国主义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殖民地。再次，中国也不会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在经济上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不可能长期平行地发展。刘少奇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③

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说："按照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4页。

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①

首先，“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但总的说来，我国经济水平还是很低的。1952年，钢的年产量只有130多万吨，平均每人还不到5斤。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虽然达3278亿斤，占世界第一位，但平均每人只有500多斤。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6.7%，我国还没有大型的机器制造业，还不能制造拖拉机、汽车、飞机，不能制造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之上的。而要改变这种情况，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其次，“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改造它们。”③当时，我国在经济上存在着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也占相当大的比重。1952年，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合起来所占的比重还不到四分之一。显然，要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需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

②③《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再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充满着复杂的、长期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①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必然遇到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阻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长期的、复杂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限制、改造，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毛泽东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③

总之，无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还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毛泽东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④毛泽东原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3—24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2—9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页。

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则为18年）。这个预计，看来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实际工作进程却超出了原来的计划，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1955年夏季以后，对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接着，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要求，以致造成在长时期内遗留了一些过渡时期应当解决的问题。出现这种急于过渡的情况，是同我们对于不发达国家过渡时期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有关的。

第三，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结合起来，把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鲜明最主要的特点，它使总路线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有了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一般说来，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它们不存在“并举”的问题。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经济比西欧国家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但苏联的工业化，是在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以后开始实行的。因此，他们的工业化，是着重处理好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苏联1926年开始实行工业化后，在一段时间内，农业合作化没有跟上，1928年发生了粮食危机。斯大林总结教训时指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即最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最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上。我们党创造的社会主

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经验，把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和技术方面的革命，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辩证的统一。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①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不可分割。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拿农业来说，只有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市场等。毛泽东说：如果不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② 又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③，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市场。所以，"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④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支持社会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1—183页。

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建设人才，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毛泽东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 由于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使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力量。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生产力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农业年年增产，工商业不断发展，国营经济愈来愈壮大，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对这种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只有在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② 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工农联盟，使国家掌握了粮食和工业原料等主要农产品，这就可以去限制资产阶级，缩小资本主义的市场，直到堵死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6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利于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对资产阶级"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①这就是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掌握了工业品，就可以和农民交换，使农民逐步摆脱资本主义的引诱，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从而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见，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

第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实现的。

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②列宁说过："为了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③但是，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党已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同时我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我国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采取暴力的方式，而是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的。毛泽东说："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①

二、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只能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恩格斯在《德法农民问题》这篇著作中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② 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个体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的唯一出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民经济中分散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大约占百分之九十。新中国建立并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小农经济仍然占着绝对优势，因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

此，把几亿农民引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大道，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毛泽东用极大的精力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

第一，正确分析土改后个体经济面临的各种矛盾，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毛泽东分析个体经济内部的矛盾，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对促进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这种个体经济积极性的长期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①为了堵塞资本主义，把农民引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毛泽东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②"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③

毛泽东分析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基本部门，二者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大工业是不能建立在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81、179页。

私有制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如果不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产品也不会有广阔的市场。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①

毛泽东分析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依靠工农联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从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信，富的也不相信，那么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②如何不断解决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呢？毛泽东说："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6—197页。

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①

毛泽东不但分析了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且分析了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两方面的积极性反映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我们党的政策是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上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这个政策是可能的。毛泽东说：“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②他在分析了我国的国情之后，指出：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时有灾荒，经营方法落后，广大农民土地改革以后生活虽有所改善，但许多人仍有困难，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毛泽东在对我们党的领导能力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指出：“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③他分析了我们党的有利条件，就是有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的经验；有建国以后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及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决议，等等。

总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既需要，又可能，潜力很大。”④党和毛泽东正是在科学分析农村形势的基础上，

---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180—181、173、119页。

因势利导，在土地改革以后，逐步把农民引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第二，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系列过渡形式。

毛泽东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①根据这个道理，搞合作化，应当考虑到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原则，既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又不能强迫命令，横加干涉。毛泽东说，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干涉过多。他指出："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②

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毛泽东确定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是：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它既不触动农民的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又可以彼此换工，互相帮助，为刚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所乐于接受，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初级社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和一定的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一方面入股的土地参加分红，保留土地的私有权；另方面又实行一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9、121页。

定的按劳分配制度，所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则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采取这一系列过渡形式的好处，一是“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二是“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三是“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形式的理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我国农业合作化是从生产领域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张合作化先从流通领域开始，然后进入生产领域，我国则从生产合作入手，辅以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三种形式彼此分工，互相促进，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小农经济。其次，我国创造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这一形式。这种过渡形式不是一下子把个体的小农经济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而是逐步过渡。这种初级社既削弱了私有制，又适当地照顾了社员的觉悟水平，它把农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种从个体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的好形式，为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三，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社会主义在农业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必须把全部土地国有化，把土地变为公共财产。过去苏联是通过没收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土地国有化的。我国的情况不同。我们是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当然不能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5页。

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来没收过去分给农民的土地，实现土地国有化，而是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渐地解决土地公有化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就是自愿的原则和互利的原则。"①

典型示范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正确原则。典型示范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本人以极大的热情，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退了社，三户贫农留了下来继续办社。毛泽东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②典型示范的方法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国家援助是发展互助合作的重要条件。对互助组和合作社来说，国家援助就是外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互助组和合作社刚成立时，在生产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国家要给以帮助，以扶植其发展。党的有关政策规定，国家在农业机械、化肥、种子、贷款等方面给予扶植和帮助，国家机关要对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生产技术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使互助合作组织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正确分析土改后我国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新老上中农，限

---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46—1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4页。

制并逐步消灭富农的方针。

苏联在大规模实行农业集体化时，农村的中农占的比重已经比较大。他们认为搞集体化要依靠贫农，而中农是农村的“中心人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让工人、干部下乡去帮助贫农。1933年，曾派了一万七千多名干部下乡成立拖拉机站政治部，这种作法效果并不好，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我国在土改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也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不少贫农上升为中农，中农一时成为农民的多数。在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我国农村的阶级状况是：土改时的老中农加上新中农已占农村农户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毛泽东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出发，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口号按照新情况加以具体化，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下中农又分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提出首先要把贫农、新下中农和老下中农组织起来，因为“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或者还不富裕……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①贫农和下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依靠贫农、下中农，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大多数和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优势的问题。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动摇的，有些人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对于富农经济，我们没有采取苏联曾经用过的没收和驱逐富农分子的办法，而是采取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在合作化初期不容许富农入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才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办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7—178页。

法，接受富农分子入社。这样，既可以减少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的反抗和破坏，又有利于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国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为“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所谓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就是对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部署和计划，要求越来越急，对生产关系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1955年夏，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只占全国总农户的14.2%，到1956年1月，就猛增到80.3%，半年实现初级形式合作化。1955年底，高级社只占总农户的4%，到1956年底，就达到87.8%，一年实现高级合作化。所谓工作过粗，就是不同程度上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命令，施加政治压力。所谓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是指没有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互助合作的水平、规模和组织形式，而是一刀切，搞单一的公有制。造成上述失误的原因，从哲学上说，一是对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二是对新旧经济转换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辩证法原则；三是思想方法上的简单化、绝对化，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等等。但总的说来，农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中国农村的一次最深刻的变革，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三、社会主义国有化和阶级消灭理论的新发展

毛泽东辩证地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提出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化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提出过的设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夺剥夺者”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则，但对资本家实行暴力没收，不是“剥夺剥夺者”的唯一途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就曾经指出：马克思曾向我多次讲过，假如我们能够用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①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两次提出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1818年5月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提出，要对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对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资本家”实行赎买。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怠工、反抗，直至发动反革命内战。1921年，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从改善工农关系出发，重提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由于当时的工业企业已经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提出采取“租让制”、“租借制”等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多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最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化和阶级消灭的理论。

第一，正确分析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

党和毛泽东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必要性。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即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基本思想，论述了实行这一政策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化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①

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是很软弱的，但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却占有一定的比重。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仍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1.8%，私营商业的营业额占全部商业批发额的76%，零售额为85%。并且，私营工业和商业遍及城乡，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对这样大量的中小企业实行没收，势必导致生产、流通的中断和脱节，影响群众生活。因此，完全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利用。周恩来说：“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它的积极性进步性。从经济上说，今天我们的国营经济还不能完全代替它，如果中国工业化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2页。

了，国营经济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经济，私人的经营范围就不会这样大。私人的经营范围这样大，就说明国营经济的比重还不够大，还不能代替它。这就一定要发挥它的积极性。”①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要剥削工人，他们是要按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因此，党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说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因此，党制定了对他们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②因此，“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③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仍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表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表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非对抗的方法加以解决。

---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illegible]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309页。

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具有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落后的、消极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进步作用占主导地位。解放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它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面性特点，不仅说明对它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是必要的，而且说明实行这一政策是可能的。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和平改造的有利条件。主要是：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①我们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实行了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割断了资本主义经济同个体经济的主要联系，使其逐步丧失了独立经营的能力；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②如果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就不可能了。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总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是采取暴力剥夺的方法，而是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这和苏联、东欧国家是不同的。周恩来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宣布把雇工若干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年也曾宣布把几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收归国有。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个早上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①

第二，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解决了如何经由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

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后者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支配的，为维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③

---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106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8、83页。

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把国营企业租让给资本家去经营，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把资本家的私营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毛泽东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①国家收购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除资本家还拿定息外，已经和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差别。总之，私营企业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过程中，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赎买形式。我国对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没有支付单独的补偿基金，而是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工人阶级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时候，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作为向他们赎买的代价。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资本家所得可占企业全部盈余的25%，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发给他们固定的定息，一般是年息5%。同时，对资本家保留了一部分高薪。所以，赎买的价值并不决定于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进程和实际需要。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9页。

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

第三，把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①

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辩证统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是资产阶级及其意识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及其意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存在的条件。只有在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实践中才能改造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资本家的思想又能为企业的改造减少阻力，创造条件。在改造企业的过程中改造资产阶级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刘少奇指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积极态度的，我们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们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们。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在资本家中举行演讲会、座谈会，开办学习班，组织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中间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3页。

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顽固分子。一句话，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①

由于我们坚持了把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方针，当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资本家在企业中的地位，已由原来的支配者、剥削者，变为在党的领导和工人监督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据有关文件规定，从1979年7月起，原工商业者改变资本家成分，按其职业，担任干部的就是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的就是工人。这是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后期工作粗糙，步伐太快；对工商业者管理企业的经验继承和利用不够，否定了一些不该否定的东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粗暴，伤了不少人，等等。但总的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是突出的，路子和方向是正确的。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是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和阶级消灭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三节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

1956年4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大规模的社

①《刘少奇选集》下册，第217—218页。

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运用辩证法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一、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著作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到1956年6月，百分之九十一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七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已成定局，我国进入了历史的转变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将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界开战，由政治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时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没有经验，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多次表示，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毛泽东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抄"还是必要的，但他对"抄"不满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三年实践经验，苏联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但也暴露了一些弊端，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毛泽东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

为了总结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1955年底起，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建国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所以，《论十大关系》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毛泽东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1965年12月27日，根据刘少奇的建议，中共中央将《论十大关系》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5卷编辑工作期间，曾向毛泽东提议，将《论十大关系》的两次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毛泽东亲自审阅了整理稿并表示"同意"，于1976年12月26日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这个整理稿。

《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从哲学上说，这部著作第一次自觉地集中地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又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中来研究矛盾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

唯物辩证法。

二、正确分析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提出解决矛盾的"兼顾两头"的原则

毛泽东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①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事物矛盾的性质各有其特殊性。大体说来，可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所分析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大多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应该坚持两点论，采取"兼顾两头"的原则。如在战争年代处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提出过"军民兼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兼顾两头"的思想。1952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两项任务要兼顾，不要偏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非对抗性的矛盾突出起来了。《论十大关系》把"兼顾两头"作为重大原则提了出来。

毛泽东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口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②鉴于当时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着重强调要注意照顾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的方面。他说，在提倡艰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275页。

苦奋斗的同时，要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适当增加工人工资。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① 毛泽东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②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毛泽东在分析和解决其他非对抗性矛盾时，同样坚持"兼顾两头"的原则。例如，在对国民经济的分析中，既强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又指出"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以重工业为主的"建设的重点"，又要十分"注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建设的布局上，既强调"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又要求"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强调"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又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如此等等。总之，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要兼顾两头，反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顾一头忽视另一头的形而上学。

用"兼顾两头"的原则解决非对抗性矛盾，这是由非对抗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274页。

性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和对抗性矛盾一样，非对抗性矛盾双方也是又对立又统一的。但其特殊性在于，矛盾双方都是积极因素，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运动的总方向是相同的。因此，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不是“一方吃掉一方”，也不是双方“同归于尽”，而是要求双方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就是说，一方的发展，是另一方发展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另一方的发展；相反，一方的过于发展或发展不够，则会妨碍、影响另一方的发展。拿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来说，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就表现为矛盾一方的发展对矛盾他方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重工业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重工业的发展也多方面地依赖于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工业提供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提供资金，提供市场，等等。形而上学看不到矛盾内部双方的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作用，以为注重一方，势必打击另一方。用这种思想指导工作的结果，不仅被打击的一方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且所注重的一方也不能得到持久的稳固的发展。毛泽东说：“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①“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②

毛泽东在论述“兼顾两头”原则时，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有时为了更好地突出和发展矛盾的一方，反而向它的对立方面用力。这也就是《论十大关系》中反复提出的“真想”还是“假想”这样一个鲜明、生动而又深刻的问题。关于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说：“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268页。

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①关于发展内地工业，毛泽东说：“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②关于原子弹，毛泽东说：“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③总之，要想解决矛盾的一方，而且是“真想”、“想得厉害一点”、“十分想”，就必须十分注意解决矛盾另一方的问题，在它的对立面上使劲。

“兼顾两头”的原则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而不适用于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例如，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矛盾，固然也可以利用敌方来发展自己，但决不是在加强自己的同时去加强对方，不应也不能搞利益上的“兼顾两头”。而只能顾一头，保障人民利益，发展革命力量。对于反革命势力，不仅不能照顾，而且还要打击它，削弱它，消灭它。只有非对抗性矛盾，例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才需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论十大关系》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领域中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深刻论述了处理这类矛盾的“兼顾两头”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毛泽东1937年在《矛盾论》中所概括的主要矛盾是具有对抗性质的、最后以一方克服一方来达到矛盾解决这样一类矛盾运动的规律。而《论十大关系》则概括了具有非对抗性质的，以矛盾双方相互规定、相互促进、兼顾两头、共同发展这

---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271、272页。

一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是对《矛盾论》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还应当指出，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是不甚充分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矛盾问题，更是国际共运史中尚未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们当然不可能进行具体的研究。列宁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经济建设实践中犯了不少错误，这必然妨碍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矛盾的研究。这样，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稍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提供的关于非对抗性社会矛盾的较完整的理论，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正确分析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提出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论述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生产单位之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关系时指出："从原则上讲，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就是说，统一性和独立性，也是两点，是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有统一性。统一性是体现全局的东西。独立性则是体现局部的东西。在全局和局部的矛盾中，全局高于局部，统帅局部，全局的命运决定着局部的命运，全局的利益决定着局部的利益；而局部隶属于全局，必须服从全局。服从全局，就是要坚持统一性。毛泽东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

导，必须有全国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离开统一性，离开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听任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社会主义整体事业就会遭到破坏。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要有统一性，而且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统一性代表着全局的整体利益，但这个全局并不是脱离各个局部而孤立存在的。全局由局部构成，否定了各个局部，全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统一性如果离开了独立性，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说：“各个单位都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生动活泼。”①

鉴于当时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把地方卡得太死的情况，毛泽东着重强调了独立性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第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②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第二，要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③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立法权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5、275页。

法。第三，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民主作风。“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系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①官僚主义地乱下命令，必然给地方设置许多框框，侵犯地方的自主权。官僚主义和机构臃肿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精减机构。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减，砍掉它三分之二。”②

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既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又要有一个与独立性相联系的统一性，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统一性和独立性关系的科学论述，关于在分配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的论述，关于要注意国民经济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平衡与协调发展的论述，关于扩大地方自主权的论述，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说明他当时看到了我国在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并能正视这些弊端，提出改革的意见。这是对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正确分析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揭示社会主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特点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除了研究经济领域的各种矛盾外，还研究了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矛盾。其中“汉族和少数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6、280页。

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用辩证法来观察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以及《论十大关系》中谈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党和非党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冲突，而是由于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矛盾的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是次要的。增强人民的团结，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对于矛盾的解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可以把矛盾各方的积极因素凝聚为同一个方向的“合力”，壮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力量。1957年4月，刘少奇在广州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强调同一性，应该使矛盾缓和，不能故意使它紧张起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对人民内部矛盾双方暂时利益不一致的倾向，要加以调节；对矛盾双方根本利益一致、主要方面同一的倾向，要充分发挥；把那些分离的力量变为朝着同一个方向和目标发展的“合力”，从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可以使矛盾各方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它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分歧点是次要的；双方都是事物发展的积极因素。这就决定了矛盾双方可以而且必须

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毛泽东在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时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虽少，但居住面积分布达全国总面积的50%至60%。“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① 和汉民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毛泽东指出，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尤其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②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它们既互相对立、互相批评，又互相合作、互相吸收。互相合作、互相吸收的同一性起主导作用。据此，毛泽东提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在内的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制定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正确方针。

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可以产生矛盾双方本来不具有的新的力量。恩格斯说过：“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③《论十大关系》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强调正确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内部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造成“新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祖国而共同奋斗。

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同一性作用的实现，不是自发的，而是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7、2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

要开展人民内部的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经过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从不统一到统一，从不团结到团结。那么，如何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性即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一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

第一，要分清是非。“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① 在共产党内，在人民内部，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总是存在的。问题是要分清是非，坚持原则。不分清是非，团结就缺乏基础，批评就找不到对象，错误向正确的转化也就不可能。

第二，要着眼于团结。“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②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③ 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只是看他们改不改，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所谓帮，就是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份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只要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表示愿意改正，我们就欢迎。即使他们一时还想不通，我们也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多想一想。要允许他们有思想反复。在他们改正错误以后，更不能揪住不放。毛泽东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④

第三，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毛泽东说：“正确的态度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3、284、369、284页。

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①允许人家革命，就是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就要给他们工作做，让他们在工作中改正错误，将功补过。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思想作风中有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人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这些历史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毛泽东除着重分析了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外，还分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一切矛盾一样，敌我矛盾双方，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但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它的矛盾斗争性居于主导的地位。解决敌我矛盾，必须突出矛盾的斗争性。刘少奇说，处理敌我矛盾要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矛盾激化，以至把矛盾的一方压倒、消灭。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同民主革命时期的敌我矛盾，又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怎样通过突出矛盾的斗争性，正确处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毛泽东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一定要分清敌我。分清敌我，是正确处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前提。毛泽东对反革命的状况作了科学的估计，指出："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③只有准确地分清敌我，才能最广泛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3，283，281页。

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反革命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毛泽东说："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①这里最关键的条件就是我们党和政府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一是社会上的镇反，该杀的要杀，但要少捉少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群众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二是机关里的反革命要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可以保证不犯错误；避免杀错人；可以稳定很多人，团结很多人；可以使反革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三是给出路。"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②

五、正确分析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发展内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精辟地论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人的好经验，也要研究外国人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③这条路线体现了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的主要哲学依据，一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一是长处和短处的两点论。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3页。

③转引自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阐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事物的根本原因。外因即事物的外部矛盾，指一事物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能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说：应当"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①根据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应当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必须注意向外国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

《论十大关系》对《矛盾论》中的上述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论述了长处和短处的辩证法，为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哲学依据。

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两分法，肯定每个民族、国家、制度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②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但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那有这个事？"③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④我们中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工农业不发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276页。

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这是两个缺点，同时也是两个优点，它可以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因为别国有长处，我们有短处，所以有向别国学习的必要；因为别国有短处，我们有长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学，不能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如果只看到本国的长处和外国的短处，不承认本国的短处和外国的长处，万事不求人，闭关锁国，是错误的；如果只看到本国的短处和外国的长处，看不到本国的长处和外国的短处，感到事事不如人，也是错误的。从每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的两点论出发，合乎逻辑地引伸出来的结论，就是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辩证地结合起来。

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是对立的统一，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中独立自主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有效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立足点，学习外国就缺乏强大的后盾，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就只能跟在别国后面爬行，丧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周恩来说：“那种认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①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学习外国，相反，它是以学习外国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周恩来说：“我们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5页。

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①在学习外国和独立自主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在一定的条件下，学习外国可以向独立自主发生转化，可以对独立自主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学习外国能够开阔视野，从比较中更加全面地认识到我国的长处和短处，清醒地看到我们和外国的差距，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冲破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保守狭隘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激发起奋发图强、急起直追的雄心壮志，从而实行改革和开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只有学习外国，才能在借鉴他们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自己的特长，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避免走别的国家走过的漫长道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根据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制定了一条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的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②这一方针，贯彻了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表明：

第一，要向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学习。毛泽东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③就是说，不但要向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226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345页。

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便把外国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我所用。敢于公开提出向一切国家学习，这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精神。毛泽东批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坏，因而“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同人家交换了”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这也是一种迷信”。①

第二，要多方面地向外国学习。人类历史步入近代以来，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经济、科学、技术交流的基础上，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早已越出了国界，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取的局面。因此，我们向外国学习，不仅是学习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东西，而且对政治上、思想文化方面的有用的东西，也应当学习和研究。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要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长处和先进的东西，抛弃它的短处和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学习，但对它们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学，只能对它进行研究，以便从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引以为戒，避免重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更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但有些国家在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是为剥削工人服务的，但“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①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某些进步的思想道德值得借鉴，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忠实、友爱团结、相互帮助的精神以及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其中包括遵守社会秩序，注重文明礼貌，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设施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借鉴吸收。西方的各种思潮和学说，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发展的机会。我们应当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第四，要把外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外国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先进的，也不一定适合我们的情况和需要。所以，要“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②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凭“风”办事的错误思想，指出“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③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指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④在我党历史上，由于党和毛泽东不断批判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401—402、286、286页。

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才使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五，坚持学习和创造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说："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①从照办到不要事事照办，生动地体现了学习和创造相结合，从学习到创造的转化过程。拒绝学习和照办，关起门来自己摸索，只能一步一步从头走别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必然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耽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原则，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先使用、照办，然后经过实践和研究，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对外国的技术进行分析鉴别，修改其经过实践证明是不合理的或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部分，增添自己独创的东西，这就是创造和发展，就是由学习、照办到创造、发展的转化。

第四节　党的八大文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哲学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毛泽东等在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287页。

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的总量”。①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②党的八大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原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和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

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正确分析我国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③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旧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表现为腐朽的上层建筑维护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它在社会关系上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腐朽的上层建筑，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317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2页。

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它们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主要不是表现为阶级矛盾，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突出起来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客观要求。

其次，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八大《政治报告》指出，除台湾尚未解放外，"近百年来骑在我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中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①

基于以上分析，八大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2—203页。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

八大依据对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分析，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政治报告》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②“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人民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二、“既积极又稳妥可靠”建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和1956年上半年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2页。

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203页。

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①“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建设方针是科学的，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它既反对了在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仍因循守旧、踏步不前的右的倾向，又反对了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全局而仓促上阵、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建设事业遵循着经济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正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②

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建设方针，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③陈云1957年1月18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八大的这一指导思想。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8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27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是冒进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① “建设规模”和“国力”这两个概念，可以进行广义的解释，也可以在特定的意义上进行解释。陈云在讲到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时候说过，原材料的分配顺序应该是：“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和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②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陈云所说的建设规模，就是基本建设的规模；他所说的国力，不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而是指安排好现有生产以后的剩余产品。

马克思说过：“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③ 就是说，不能把全部产品都作为搞基本建设的国力，而只能是先满足现有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现有职工维持劳动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剩余产品才能作为搞基本建设的国力。剩余产品中还要有一部分用来满足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而且还要拿出一部分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扣除了这些以后，才能够用于新的建设。要使国家经济持续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就必须使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国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

①②《陈云文选》（1956——1985）第14、4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6—637页。

定大了，就会造成各个方面的紧张；基本建设规模定小了，就会影响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所以，右倾保守和“左”倾冒进的倾向都是必须反对的。陈云根据我国多年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容易”的思想。他说：“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①

要做到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唯物地辩证地分析客观情况。要反对浮夸和说假话，要坚持两点论。在形势有利的时候看到不利因素，在形势不利的时候看到有利因素。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在制定1955年计划的时候，由于片面地估计了前两年农业歉收这一情况，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结果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建筑材料出现了虚假的过剩现象，最后只好用出口的办法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我们在制定 1956 年计划的时候，由于片面地估计了上年度农业丰收和社会主义改造巨大胜利这一情况，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结果造成财政比较紧张，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造成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周恩来说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

---

①《陈云文选》（1956—1985）第44页。

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①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有利形势和不利形势是对立的统一，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形势有利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看到有利形势中隐藏着的不利因素，既积极又慎重地制定方针和政策，这样才能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形势不利的时候，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于不利中看到有利因素，积极创造条件，化不利为有利，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

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建设方针，“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②重点建设和非重点建设是一对矛盾，重点建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观察和处理这一对矛盾时，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无论是重点建设还是非重点建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要全面安排，不可偏废。如果只抓住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但是，重点建设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全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必须保证重点建设。如果把重点建设和非重点建设等量齐观，就会犯形而上学的均衡论的错误。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总结了在处理重点建设和非重点建设方面的教训。他说，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1956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

---

①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铧犁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结果造成了钢材供应紧张的情况。周恩来总结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①

三、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正如陈云指出的："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②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对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概括地说，就是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没有找到一种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经济体制。

党的八大注意到了经济体制问题。陈云在八大发言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③ 为了

---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1页。

②③《陈云文选》（1956—1985）第1、4—5页。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八大的报告或发言中，提出了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其基本点是：

第一，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共同发展。陈云指出："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① 又说："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② 因为片面强调集中生产、集中经营、容易造成产品单纯、规格减少、质量低劣，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经常变化的需要。放开让劳动者分散经营，能够扩大产品花色品种，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

八大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问题，都作了积极探索。1956年12月，毛泽东找统战部、工商联、民建的同志谈话，关于地下工厂的问题，谈到这样的意思：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开私营工厂。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认为，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投资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

1956年12月，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议上讲话，讲到资本家

---

①②《陈云文选》（1956——1985）第6、13页。

如果要盖工厂，是不是准他们盖呢？可以的。他还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一个补充嘛。

1957年4月国务院会议讨论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周恩来说到：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三轮车、摊贩都可以自负盈亏。有些私人办的小学，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行都可以来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①

以上情况表明，当时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放开一些私营企业方面，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从社会需要出发、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出发的。但是在以后的实践中没有这样做，离开了生产力去强调“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私营、个体都要割得干干净净，背离了原来的正确主张。

第二，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开放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说：“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

①以上三件材料，参见龚育之：《思想解放的新起点》，1988年6月2日《文汇报》。

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这就为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我们的经济发展，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多样性。只有坚持统一性，坚持计划经济，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保证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协调发展，保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是，国家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事事统一。因此，不但要有统一性，还要有多样性、灵活性。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些产品可以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是对立的统一，计划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由生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二者密切配合，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克服国家机关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的现象，使地方具有适当的自治权利。刘少奇说：“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②这就是说，要正确处理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关系，把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国家应当加强对企业的

①《陈云文选》（1956——1985）第13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3页。

领导，但这不意味着把企业统得过死。而是要深入企业，了解情况，该管的认真管好，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企业应当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这样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①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探讨经济体制问题，是关于生产关系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实施，但对尔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从哲学角度讲，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贡献。

四、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形势下，上层建筑必须随之不断改进和完善，才能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党的八大文件论述了如何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问题。

第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②

“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改进国家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③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在建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3、241、248页。

国后的几年，在国家机关中，滋长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风，如高高在上、不了解或者压制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等等。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必须坚决反对，切实克服。

改进国家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①建国以后，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把国家的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央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样样都办好，是不可能的，应当把一部分行政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有许多事情，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是改进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③在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9、250、253页。

律，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建国后的几年中，我们国家比较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我们国家建立不久，法制还很不完备；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还不强，不遵守法纪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政治报告》指出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①

第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党执政后，特别是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都作了深刻的论述。

"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②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回顾了党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犯过几次大的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原因在于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克服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终于夺取了全国的胜利。"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对新情况、新任务，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繁杂和不熟悉的问题，发生主观主义错误的危险性更大；同时，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我们脱离实际，脱离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265、268页。

群众，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必须加强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害；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组织力量从事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大大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用空想代替调查，由感情定出政策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为了保证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必须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八大强调要正确解决党的各种关系，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既要反对过度集中，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在当前则要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的下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

在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上，八大强调，一切重大问题要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要容许不同观点无拘无束地讨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意见；对于动机正确、按正常程序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八大指出，当前主要倾向是不适当地过分的中央集权，一些组织的负责人习惯于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来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这些必须加以反对。

在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八大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

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又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阐明了领袖的作用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是，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领袖人物的威信、影响和经验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的财富。当然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工人阶级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人民对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我们党历来反对对于个人的神化。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①

总之，八大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是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但是，由于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全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来得很快，党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准备都很不足，对在建设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加以警惕和预防，因此，八大也有一些历史局限性。表现在：

---

①《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

第一，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并由此得出了斗争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生产力的科学结论。但是，它没有充分认识到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可能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人民内部矛盾有时可能激化的复杂性，没有提出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要正确认识阶级关系变化后社会政治生活的新特点和应采取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在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是不确切的，容易使人误解为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不存在什么矛盾，似乎今后的任务就是单一的发展生产力了。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因而当社会上出现某种对立或激化的现象时，就很容易夸大这种表面现象，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对八大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论断发生动摇，重新回到“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指导思想上去。

第二，八大正确地提出了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进行建设的方针，但没有明确提出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冒进的倾向是当时的主要危险，没有对中国国情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更为深入的分析。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八大以后脱离客观实际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看待八大的这些不足之处。本来，只要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八大正确路线，这些不足之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丰富而逐步加以纠正的。但八大以后的历史表明，党不但没有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反而使

“左”倾错误思想蔓延开来，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盘否定了八大路线。这个教训应当永远汲取。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八大作为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标志，将永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十三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揭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但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主观主义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错误地估计国内政治形势，重提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趋严重。后来，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之，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有辉煌成就，又有严重失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迂回曲折中发展的。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伟大贡献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国际共运

史上的新课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著作中，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着重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篇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著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与补充，于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重要著作是在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产生的。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消失；广大群众一方面欢迎新制度，一方面又感到不习惯，有些人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政府工作人员缺乏领导社会主义的经验和能力，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组织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不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许多干部存在着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①

在国际上，1956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2月，苏共二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6页。

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在领导苏联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对他的功过缺乏客观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同时，苏共二十大使长期被掩盖的苏联国内的矛盾、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就促使各国人民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影响，走本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弊病，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风波，闹事的情况几度发生。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先后大约有一万工人罢工，一万学生罢课。这一系列事件暴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

在国际、国内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课题。“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①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包含了许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讲话时，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经过毛泽东修改于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概念，不过当时是就国际范围讲的。随着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分析了国内闹事的现象和原因，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①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来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他反复酝酿、深思熟虑的成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突出提出来加以研究，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应当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开始跃居突出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了概括和分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二、批判“无矛盾论”，阐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究竟存在不存在矛盾？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以前是没有明确解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谈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还存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存在按劳分配，因而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差别、不平等也就是矛盾。但马克思由于社会实践的局限，不可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列宁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他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事物的差别和矛盾。1920年5月，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针对阶级对抗到处有它的表现的观点，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中，对抗将消失，矛盾仍然存在。这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矛盾的。当然，列宁由于逝世过早，只有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出全面的明确的回答。

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斯大林对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也作过一些分析，使用过"内部矛盾"（指工农间的矛盾）和外部矛盾（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样的概念。但是，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完全适应"的，是没有矛盾的。这就否认了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后来，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试图纠正自己的错误，但这种纠正是吞吞吐吐的，不彻底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斯大林的观点对我国五十年代的理论界有很深的

影响。

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和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社会矛盾问题。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① "社会上的事情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② 他指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③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④ 毛泽东的论述，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

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51、384、372页。

的。在这些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是什么？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因何在？这个长期以来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之前一直悬而未解。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基本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提供了解开社会发展变化之谜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崭新概念，从总体上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矛盾运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重新考察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对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科学的概念。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马克思把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物的矛盾法则应用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①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因为它们的矛盾运动支配整个社会生活，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毛泽东的这一科学概括从本质上把握了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由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进而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③根据毛泽东的论述，这种根本不同主要表现在：

首先，矛盾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的生产关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372—373页。

人，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的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基本消灭了旧社会那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即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是改造私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杠杆，也是组织经济建设、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力工具。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不相适应的一面。毛泽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① 在生产关系方面，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寻找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两种所有制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在上层建筑方面，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国家机构中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中还存在缺陷，等等。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在基本适应情况下的不适应，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其次，矛盾的表现形式不同。由于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对抗性的，革命阶级为了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求得自身的解放，就要冲破旧的上层建筑和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上层建筑和新的生产关系。这样，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二者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非对抗状态中共同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再次，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由于具有对抗性，因而不可能由旧社会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努力来解决。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要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就雄厚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它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有矛盾，不够完善和成熟，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但它作为新型的社会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认识这一点，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

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①

四、第一次明确提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两类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作过一些设想和论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并指出主要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恩格斯在《反对杜林论》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论述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列宁曾经比较全面地分析过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事物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等各种复杂情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思想。但列宁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情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七年，战争频繁，阶级斗争极其残酷，他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尖锐的敌我矛盾上，不可能把两类矛盾问题、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重大的理论课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374页。

题，作为一门科学提出来进行全面地研究和论述。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大量表现出来，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他试图从理论上作出概括和说明，指出："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① "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② 但是，他在理论上使用"矛盾"与"对抗"、"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概念时，往往有所混淆，并把"内部矛盾"归咎于"外部矛盾"，特别是把党内的有些本来属于正常的意见分歧，也错误地归咎于"帝国主义外国间谍"的活动，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一度认为没有矛盾了。如果有矛盾，根子也在帝国主义。这更是理论上的倒退。

毛泽东以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第一次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页。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43页。

盾。”①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在于："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②之所以有这种性质的不同，是因为这两类社会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矛盾产生于敌我利益的根本对立，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在人民内部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质的区别，是我们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的重要尺度。但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完全一致的，敌我矛盾无疑是对抗性矛盾，但不能说凡对抗性矛盾都是敌我矛盾。

那么，怎样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毛泽东指出，首先应该分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是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③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只有那些站在反动立场上，敌视、反抗、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才是人民的敌人。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矛盾，才是敌我矛盾。人民范围之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这些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诚然，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36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的，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敌我矛盾转化。他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①同样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也可以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毛泽东指出："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②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③因此，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事实证明。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由于资本家愿意接受和平赎买政策，因而最终实现了由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 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研究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阐明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首先，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社会生活的突出地位。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但在不同的社会里，其表现有不同的情况。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这一时期，在革命阶级和革命阵线内部虽然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矛盾，但从整个社会矛盾来说，敌我矛盾处于突出的主导的地位，解决这个矛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共同的斗争目标。而革命阶级和革命阵线内部的矛盾或者被掩盖、被冲淡，或者比较易于处理，因而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于是，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地位，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矛盾由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任务由政治革命转变为为经济建设，主要奋斗目标由夺取政权转变为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种

情况下，人民自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物质文化需要，而由于生产落后又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基于物质利益而提出了许多实际问题，如工资问题、就业问题、升学问题、住房问题等等；基于经济根源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如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国家和集体与个人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等等。总之，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社会生活的突出的中心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其次，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完善，上层建筑不成熟，因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敌我矛盾是极少数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深入地详细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包括工人内部的矛盾，农民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第二，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第三，不同民族、地域、部门和行业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例如，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和流通相互间

的矛盾，生产建设同科学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等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是一个具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纵横交错、互相影响的矛盾系统。正因为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工作重点，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再次，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

社会发展的最终根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手段。通过阶级斗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不断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不复存在，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不是表现为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具体地说，人民内部由于社会生产体系中实践地位和具体利益不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差别，等等），视野不同（认识问题的角度、广度、深度的差别，等等），思想状况不同（思想觉悟的高低、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程度及所取的态度的差别，等等）对发展社会生产，组织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要求、主张和办法以至不同的行动。这样就产生了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这种意见和那种意见的矛盾和斗争。

如何解决这类矛盾，是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出发点；这类矛盾解决得如何，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要繁荣富强起来，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五、科学阐明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从总体上提出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他说：“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①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提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作了说明和发挥。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对人民实行民主两者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对人民的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更有效地镇压敌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对敌人专政又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保障，只有坚决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剥夺敌人的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国家的法律，它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任务。“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页。

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①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任务。”②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职能不能削弱，还必须加强，必须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借以保护人民利益。

毛泽东为解决敌我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等。就是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敌人罪恶大小、情节轻重、态度好坏，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改造反革命本人，而且有利于争取团结他们的家属和亲友，促使一部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这是因为：第一，“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③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去解决，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达到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第二，人民内部矛盾大都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④第

---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366、365、368页。

三，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①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但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自由是有领导、有纪律的自由。毛泽东批评了有人向往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抽象地谈论民主、自由的错误观点，论证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②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采取适当的行政手段是必要的。毛泽东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③当然，在发布行政命令的同时，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1、368、369页。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毛泽东说："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①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定矛盾的性质，实事求是进行处理。如果发生错误，就要倾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坚持民主原则和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密切联系的。离开民主原则，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而离开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也就不能真正坚持民主原则。两者缺一，都不可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根据我党多年来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毛泽东概括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

第一，"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 这是处理思想政治领域中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里，团结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如果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味批评和斗争，就势必把事情弄糟，使矛盾更加尖锐。当然，讲团结不是主张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而是要求通过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分清是非，解决矛盾，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里讲的"基础"，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页。

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离开这些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实现人民内部的团结。

第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处理经济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说："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①实现这一方针，要求"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②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安排。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毛泽东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③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才能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服务。

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方针，同时也是在思想

---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387、399—400页。

文化领域内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方法。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首先提出这一方针。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毛泽东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①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是因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②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是为了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使科学和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帮助人们开展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毛泽东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288页。

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些基本原则是全国人民团结前进的政治基础，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违背这些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①

第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矛盾的方针。为什么要使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②实行这一方针，就要切实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谓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之所以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③当然，“长期共存、互相监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2、394、394—395页。

督”的方针，也是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原则基础之上的。

上面列举的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阐明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方法。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相应地，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些具体方法来说，上述方法又是一些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在运用这些一般原则和方法时，还需要与具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著作，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大规模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国内国际情况错综复杂，新情况新矛盾初露端倪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局限性。

第一，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不恰当的、过于严重的估计。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划分只能以经济为标准，而不能以政治、思想为标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不再存在了。而毛泽东不但认为资产阶级还存在，并且把它和地主、富农、恶霸、反革命摆在一起，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第二，党的八大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的转变问题，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到毛泽东其后不久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不能说不是对八大观点的怀疑和动摇。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坚定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因素，因而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

社会生产力，消除造成人民内部差别和矛盾的物质原因。

第四，毛泽东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方面。但是他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存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权力过份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因而不能自觉地意识到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由之路。

可以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既是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也隐含着从“左”的方面背离这一方针的某些潜在因素。当然，人们不能因为这部著作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而抹煞它的理论光辉，否定它的重大的理论价值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以后，在党内外引起强列反响，给予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1957年上半年全党和全国人民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具有代表性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议。2月，刘少奇约请了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的一些同志，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深入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作了多次重要讲话。4月回到北京后，他又利用陪同外宾的机会，在上海市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篇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关于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的许多重要思想，补充和发挥了毛泽东的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第一，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

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本来，这个问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已经宣布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但是，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国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部分同志又迷惑起来。他们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敌对阶级之间矛盾的爆发，企图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虽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但这些同志却总想回到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的结论上去。正如刘少奇指出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①

刘少奇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明确指出："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② 他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经过公私合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消灭了。当然，剥削阶级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个尾巴，他们中的少数人还会进行破坏活动，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但是这些人已经无法作为一个阶级在活动，不能把我们与他们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刘少奇对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并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工人阶级

---

①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0、296页。

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与农民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等等，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明确的表述，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它体现了刘少奇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勇气。这个论点以更明确的语言概括了我国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主要工作方针，对正确引导人们认识我国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阐明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

刘少奇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①因为，“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的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②他指出，官僚主义是闹事的原因。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矛盾就可以缓和。对于群众中间的过高的要求，不合理的要求，错误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③刘少奇提出，各级党委对群众提的意见和要求要当大事来抓，要号召工人、学生、机关职员提意见，提要求，对于这些意见和要求，能够办到的一定要办，不能办到的要向群众解释。这样，就可以主动解决人民群众中积累的问题，就可以避免闹事。

---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3、303、305页。

刘少奇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①他列举了在奖金、工作安排、住房分配上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接着尖锐指出：“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跤子。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②

第三，阐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克服的几种错误观点。

刘少奇认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首先是认识矛盾，对矛盾的性质要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对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确定错了，在处理方针上就要犯错误；方针错了，那在一系列的具体办法上都要犯错误。矛盾的性质确定以后，再决定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指出：“当着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的时候，要去解决矛盾，就要强调斗争。当着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的时候，我们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③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企图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群众闹事问题的错误认识，刘少奇批评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激烈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4、304—305、302页。

就不过瘾。”①如果群众闹事，我们的领导者不是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是去想尽方法去满足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而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②

刘少奇不但提出了解决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方法。而且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克服的几种错误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③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的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刘少奇指出：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④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讲群众的非，抹煞群众的是；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他指出，首先应该检查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的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讲缺点，也要讲成绩，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⑤有这种思想的人，对群众中的闹事，只讲斗争，不讲道理，结果使矛盾激化。刘少奇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种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⑥刘少奇认为，如果把群众闹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就是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就犯了根本错误。他还指出，

①②③④⑤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2、301、307、308、308页。

对犯错误的干部，也应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除开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①

综上所述，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刘少奇作了许多过细的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它是党关于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发展和贡献。

第二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破坏和党中央毛泽东对错误的反思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错误。当发现错误以后，党和毛泽东又认真总结经验，力图加以纠正。失误，反思，再失误，再反思。在曲折的道路上，毛泽东哲学思想既遭到破坏，又在某些方面继续得到坚持和发展。

一、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

---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8页。

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对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缺乏正确认识，更由于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在实践中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讲话中，也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第一，反复批判“反冒进”，轻率发动“大跃进”。

“反冒进”是1956年6月间，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是在经济建设中，要从′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既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纠正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偏差起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1956年下半年的纠正急躁冒进，调整基本建设，也是肯定的。他说：“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哪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①

但是在胜利面前，毛泽东忘记了已经总结的经验教训，把本来正确的思想当作右倾来批判。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接着，《人民日报》在11月和12月连续发表两篇社论，第一次提出“跃进”的口号，批评“反冒进”，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是“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上的懒汉”。1958年1月党中央召开南宁会议，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页。

毛泽东再次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2月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批评“反冒进”，规定以后不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提反对右倾保守。南宁会议后，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3月，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会后，全国上下不断开展反右倾，批评“反冒进”，批评经济建设中的“稳妥派”、“观潮派”、“促退派”，在全国造成“大跃进”的紧张气氛。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就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1956年6月党中央提出的‘反冒进’，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是遵循了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而“大跃进”则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原则，违背了客观规律。从“反冒进”到“大跃进”，是党犯主观主义错误的标志。

第二，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急于过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无论是质变还是量变，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如果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不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该变不变，或者任意乱变，都会加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根本

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其不完善的方面渐臻完善，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在农村，高级社的脚跟尚未站稳，就断定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了，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又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①北戴河会议以后，农村人民公社一轰而起。1958年9月1日公布了北戴河会议的消息，9月10日公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0月底，全国就建立了26000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亿2千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人民公社有些什么特点呢？首先，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当时一般是一个乡一个公社，有的是几个乡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县一个公社，公社实行集体所有制，并采取了许多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共产"措施。其次，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穷富拉平，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劳力。再次，取消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说它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最后，在组织上搞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给予大力赞扬和支持。他曾亲笔题词：

---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25页。

人民公社好。他在视察农村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①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然而这个模式是脱离中国现实的，因而是空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时的人民公社，在生产规模上求大，在所有制形式上求纯，在分配原则上求均，在组织职能上求全，脱离了我国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情况，1958年河北徐水县是全国共产主义的试点县，县委提出1960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那时，这个县的粮食平均亩产100公斤，每人占有粮食100公斤。这是离开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

第三，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之下，离开客观规律和一定的物质条件，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就会陷入唯心主义。

从1958年开始，由于错误地批判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因而经济工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蔓延开来，表现为过高地估计人的主观力量，勉强去做那些不具备客观条件、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在当时的报刊和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

①转引自《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6号第38页。

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类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经济工作中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断言农产品的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根据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决定1959年的粮食指标为8000亿斤至10000亿斤。规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即由530万吨猛增到1070万吨，同时规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的钢产量。伴随着高指标、瞎指挥而来的是浮夸风。这股风的特征是“假、大、空”，即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高产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1958年报纸报导小麦亩产7,230斤，旱稻亩产82,525斤。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践踏。

在经济建设中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在哲学界也有所反映。1958年2月至9月，《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理论战线》等重要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有的作者认为，客观规律是以一定条件为基础的，只要消灭或废除了产生某种规律的条件，也就可以消灭或废除这种规律。有的作者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类错误口号作哲学论证，说：“正因为事物是永无休止地向前发展的，农业增产的潜力是无穷的，那末，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完全辩证唯物主义的。它是一个具有充分革命精神的口号。”

1959年2月，《理论战线》、《新建设》等杂志开展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系问题的讨论，许多作者批评“无条件论”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他们指出：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在有目的有意识地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并依照客观规律去规划、检查和调整自己的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世界。产生规律的“前提”，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存在，它只能为事物本身所产生的新的条件所否定，但不能由人随心所欲地去消灭它。

二、对主观主义错误的初步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

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在实践中受到了惩罚。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一系列讲话和他在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意见以及党中央的有关决议，初步清理了主观主义错误，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从思想上说，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对此，毛泽东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毛泽东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反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浮夸风。他主持起草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

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①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不良作风，向全国各级干部写了一封信，着重强调了讲真话的问题。信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②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节约粮食要十分抓紧、播种面积要多等等合乎实际情况的意见。他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标。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③

毛泽东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头脑要冷又要热，这是统一性的两个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0页。

②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813页。

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要跌斤斗，这些人应该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①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遵循客观规律，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两种不同意见。他在一封信中指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区，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在另一封信中，毛泽东又提出，除讨论三级所有、三级核算，还应当讨论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编者）部分所有制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告诫基层组织的同志：“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②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9页。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4页。

第二，实事求是地规定中国现阶段应当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所有制、分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在农村，生产队所有制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一中心问题，从现实情况出发，以历史经验为借鉴。从理论上、政策上展开了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指出："我们和农民关系相当紧张，农民不愿意交售粮食、棉花，普遍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回答问题。"① 他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他指出："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②

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批评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

①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1、332页。

由于生产和劳动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① 他批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认为这是“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②“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③ 他尖锐批评说：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在商品、货币等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充分肯定商品、货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货币。在他们看来，人民公社既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它们的生产品就可以由国家直接调拨；在人民公社内部已经或者即将全部实行供给制（所谓按需分配），那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他们起草的文件，故意避开使用商品、等价交换这类概念。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

---

①②③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2、333、335页。

要大大发展。必须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不应当害怕商品生产。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民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①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价值法则。他说，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不久，党中央从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中提出的要求，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他在对山西省一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②

---

①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0、335页。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在所有制、分配、商品货币等等问题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和农民处于紧张状态的本质，在于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人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① 为了解决这个大矛盾，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规定了以调整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就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②

第三，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我们通常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但一经发现错误，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批评。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反对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

①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1—332、322页。

过渡，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了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这是错误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认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的错误，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重申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决议》强调指出："无论是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决议》还说："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①

毛泽东不但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而且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30页。

问题也作了积极探索。他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①

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划分阶段的。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灭亡。共产主义时期也还要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再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毛泽东也作了积极的探索。首先，他指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②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③毛泽东使用的“社会革命”这一概念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的含义是不一致的，但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可取的，和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

①②③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166、166页。

综上所述，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全党认真纠正“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过程中，从思想理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我国现阶段应当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等问题都做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科学观点。如果只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而看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作出的努力，是片面的。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左”的思想没有根本转变，当时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纠正错误的，因而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从理论上说，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提出上述许多正确观点，但这些观点是比较笼统的、一般的原则，没有作深入的论证，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之具体化。毛泽东虽然提出我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为什么说我国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的阶段？它有什么特征？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这些问题都未能详细论证；毛泽东虽然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没有找到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形式，没有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同时，上述理论并没有在全党开展学习，也就没有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掌握。从实践上说，虽然改正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性的高指标，但仍然制定了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和反对了平均主义，却仍然保留着供给制、食堂这些平均主义的东西；虽然放慢了过渡的步骤，却规定了一个固定的“过渡”模式，而且预定的过渡时间仍然是过快的，等等。尽管如此，由于全党的努力，在这个期间，我们党所犯的“左”倾错误毕竟是在逐步地改正，形势毕竟是向着好的而不是朝着更坏的方面发展。只是到庐山会议的后期，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中断了纠正

“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三、彭德怀、张闻天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信的第一部分肯定了1958年的成绩。第二部分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党的主观主义错误，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分析了1958年错误的后果和性质。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①

彭德怀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②主观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增长起来。”他指出，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造成一种假象，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研究原料来源、设备情况、运输能力、产品销路等等。”这种“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

①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41、341页。

重大损失。”①

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②他说，在“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局和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③他认为，要彻底克服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错误，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

彭德怀的这封信，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指出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错误。

张闻天认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指标太高，求成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二是“共产风”、“一平二调”，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三是“强迫命令，浮夸虚报”，使我们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受到影响。

张闻天认为，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

---

①②③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341、342、342页。

讨。”①他本着这一精神，着重从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第一，坚持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的主观能动性。张闻天说：“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②因为任何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条件之中，人的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离开一定的条件就不能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张闻天指出，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

第二，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用政治口号代替客观经济规律。张闻天说：“按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③但是，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有人根本无视经济规律，认为只有政治挂帅就行，甚至说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④

第三，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反对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张闻天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对

---

①②③④《张闻天选集》第491、491、492、493页。

立的统一。“离开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以至灭亡，是全然不可了解的。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同样，“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入机械唯物论”。①张闻天认为，根据我国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仍然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应该急于在所有制问题上搞穷过渡。“集体所有制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现在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②在分配问题上，“要坚持贯彻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普遍实行“吃饭不要钱”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认个人利益”，“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③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张闻天还提出一个可贵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

①②③《张闻天选集》第519、496、497页

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①

第四，坚持党的民主作风，反对随便扣帽子的错误做法。张闻天针对当时党的民主作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认为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②他认为，我们是执政党，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对于群众意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③张闻天反对给提意见的人随便扣帽子的错误作法。他提出：“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④张闻天坚持真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⑤

彭德怀、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方法也是合适的。但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以及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使党的实事

---

①②③④⑤《张闻天选集》第497、500、501、500、504页。

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践踏，助长了浮夸、说假话的主观主义思想。

四、倡导学习马列著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从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错误，毛泽东反复号召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他强调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① 毛泽东指出，将来有时间，还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且作了长篇评论。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①

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7月2日，他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意见是很好的，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读书。这年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小组，还邀请了经济学家参加。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肯定了读

---

①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49—150页。

书小组的办法。他提出读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并对读书时间的安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2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把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作了整理，以读书笔记形式向党内一部分同志作了传达。这些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也包含有认识过程中的某些失误。

毛泽东带领全党同志认真读书，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说：研究马列主义，“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① 当时全党的读书活动，对于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纠正经济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错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读书过程中，强调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条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孤立静止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认为对马列主义要尊

①转引自197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重，但不要迷信。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不能停留在马克思的现成结论上，而应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阐明了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写不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7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①

克服主观主义，端正思想路线，不但要认真读书，而且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着重谈了调查研究问题，他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

---

①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36页。

年，实事求是年，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而归结起来就是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即“三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农村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中央的同志，省、地、县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自的典型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认真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①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这次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当时说：这是三十年前写的一篇老文章，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1961年3月14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对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一文给予高度评价，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这封信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分析，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调查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92页。

广州会议一结束，中央领导同志就纷纷赴各地调查研究。从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进行调查。4月下旬至5月下旬，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3月下旬至5月上旬，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调查。4月和5月上旬，邓小平、彭真领导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他们在调查期间，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就所有制、分配、粮食征购、供给制、评工纪分、食堂、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并及时同毛泽东交流了情况。

在这期间，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送交了许多调查报告，写了许多信。为了交流经验，推动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毛泽东转发了一些中央、中央局和省委负责同志的调查报告和通信，并写了批语，供各地参考。他在批转张平化的来信中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①

5月下旬和6月上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6月16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示》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5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97页。

工作。

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不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而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理论。

第一，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196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问题的一封信中指出："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我们无论办任何事情，首先要了解工作对象的具体情况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定下工作的决心，制定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办法。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要情况明，就要搞调查研究，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在于没有调查研究，离开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信中指出的："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② 所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应该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

①②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94、293页。

则。

第二，第一把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反复强调党的第一书记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他说："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①同时，第一书记亲自调查研究，可以起着榜样的作用。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三南"（中南、西南、华东）会议上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所以，中央提出："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②

第三，调查研究应当有正确的目的、态度、作风、方法。党中央指出："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③

第四，把调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1961年全党社会调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调查研究的目的不是为着

①②③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94、293—294、294页。

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不是为着个人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把调查研究和纠正错误结合起来。调查研究工作越广泛、深入，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认识就越深刻，纠正错误也就越彻底。1958年以来，农村公共食堂一直作为人民公社的一项重要内容。1960年11月中央制定的“十二条”，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开始考虑要不要继续办食堂的问题，但“六十条”草案中仍然规定“应该积极办好”。1961年5月下旬和6月上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各级领导对农村所作的进一步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有关食堂的规定，作了重要修改，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人民公社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普遍发展高级社以后，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并由此而产生的生产权和分配权不统一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后，于1961年9月29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信中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全国各地随即普遍进行了关于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调查结果表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99页。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当时，这是一个进步。

1961年开始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我们党建国以来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和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许多文件，对于转变党的作风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重新认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重新学习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纠正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六十条"的制定和修改，就是调查研究的巨大成果。在对农业进行调查研究的推动之下，其他各业也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分别制定了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尽管由于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限制，这些工作条例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但是，它们的制定和实施，表明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纳入较为正确的轨道。这就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教训，毛泽东重视从思想路线上加以总结。1959年至1960年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60年所作的《十年总结》，1961年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5月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所写的前言（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所选辑的《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一文，都是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思想成果和哲学概括，在不少问题上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鉴于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发生了严重失误，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和宣传认识论问题。1964年9月25日，他在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起草的文件上，写了一个重要批语，强调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得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①他本人在联系中国实际研究认识论问题时，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科学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对认识论的许多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

第一，积极探索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认识路线问题。

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是以如何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前提的。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出哲学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③凡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感觉、观念、思想，否认认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就属于唯心主义的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认识路线；凡是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感觉和思想是人的感官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就属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但是，列宁没有明确地把实践引入认识路线，整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没有把实践放在突出的地位。

毛泽东对哲学基本问题和认识路线问题作了积极探索。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哲学斗争时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① 这一论断形象地表明哲学战线上不仅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且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对于人们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理解全部哲学史，无疑是有帮助的。

关于认识路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哲学上的认识路线提供了依据。1963年5月，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写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② 主张人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张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的认识路线；主张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对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的精辟概括，它为我们判定认识论上的哲学派别提供了正确标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思想。

第二，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

关于实践的形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作了一般论述。他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阐述较具体，对于科学实验，则只是一般提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三大革命实践，认为它们是正确认识的源泉。1963年5月，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应当指出，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继续把它作为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不合适的，而把科学实验作为基本实践之一，则是有远见的和有重要意义的。

毛泽东重视科学实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杨振宁认为，毛泽东看得很远，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社会的将来。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把"科学实验"引入"实践"之中，这不仅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认识方法放在辩证唯物论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而且把科学家的活动放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把科学家的活动提高到与变革现实同等的地位上来。

第三，进一步发挥了实践标准的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

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②建国以后，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检验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③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这一重要概括，使实践标准的思想更加鲜明、准确。

毛泽东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有时出现暂时的失败并不能证明思想不正确的新观点。他认为检验一种认识是否正确，要看根据这种认识去实践能否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④这一论断一方面揭示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及其社会原因，说明先进势力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败，不能证明它的指导思想不正确。所以，应当坚持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揭示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因为用认识指导实践，一般地说，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错误的，但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中即使暂时失败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所以，又应当坚持实践标准的唯物论。

第四，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过程作出了新的概括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又有了新的概括和阐述。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揭示了认识的发展过程。他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有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并不是孤立地进行斗争，而是组织起来，集体行动。领导者不是个人独断专行，而是集体领导。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依靠群众，这就要求高度发扬民主，以调动集体一班人以及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这个实现正确领导的过程，也就是民主——集中——民主的循环往复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作了新的概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各种活动中，取得丰富的感性经验，经过头脑的加工制作，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物质转化为精神，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把第一阶段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精神转化为物质，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如此循环往复，构成物质——精神——物质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鉴于1958年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论述，和《实践论》比较，有了新的进展。首先，《实践论》虽然也讲到人们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一个事物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但它的侧重点是讲整个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穷尽的，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其次，毛泽东特别强调，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需要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是一个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的过程。他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遭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人们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够逐步地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②再次，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的无限性，1965年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一文中指出：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③最后，毛泽东强调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于光远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④毛泽东的话启示人们，要想变革环境、改造世界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才能逐步深入。强调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就能更好地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直观的反映论的缺陷。

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概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特别是我党领导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大体说来，物质——精神——物质的过程，揭示了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

---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9页。

③④参见周培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99—203页。

认识——实践的过程，揭示了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动力和手段；个别——一般——个别的过程，揭示了在实践中认识物质世界的范围和秩序；群众——领导——群众，民主——集中——民主，这两个过程则是前几个过程在党的领导工作和组织内部的贯彻和体现。由于上述五个认识公式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因此毛泽东在研究认识论问题时，往往不是孤立地谈论某一公式，而是紧密结合实际，把五个公式糅合在一起来谈论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的。

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概括，特别是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一文中指出：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两个飞跃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实践论》解决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主观能动性问题，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解决的。

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阐述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对这个理论所联系的实际内容则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当时全党要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另一方面要抓阶级斗争即"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对上述两个方面任务的分析，都是"正确思想"。显然，后一方面不是正确思想，而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是党和毛泽东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的表现。

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自由和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围绕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个中心，研究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围绕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确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一步探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

在哲学史上，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都从理论上作过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都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前人优秀的思想成果，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给予了唯物的辩证的解释。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合理思想，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① 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② 从恩格斯的话中可以看出，自由不单是认识问题，而是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思想，只是没有明确作出这一结论。

毛泽东继承并深化了恩格斯的思想。早在1941年，他在一篇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③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页。

泽东又多次论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重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①1965年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他再次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改造。光有理解还不行，还必须对客观有改造，对客观弄清楚了，加以改造，才能自由。毛泽东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富有新意的哲学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这个论断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对自由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规定。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说："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②人们在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必然性的认识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就获得了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必然和对必然的认识，就没有自由可言。自由更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为必然性作为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有通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被认识；这种认识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实现人的自由。离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人们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可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丢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全面理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解自由。毛泽东说，坚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就必须“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就是要“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① 否则，就不能正确处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不能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②

其次，这个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同旧哲学的区别。毛泽东关于自由和必然关系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正是这个特征，把它和旧哲学的各种关于自由和必然的理论区别开来了。旧哲学长期不能理解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要么以必然排斥自由，根本否定人类自由，从而陷入宿命论；要么以自由排斥必然，主张绝对的人类自由，从而陷入唯意志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实践观。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虽然提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重要命题，天才地猜到并试图论证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同样由于没有科学的实践观，仍然未能科学地解释二者的统一。毛泽东总结说：“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③ 这是毛泽东对哲学史上关于自由和必然理论的科学总结，深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联系和区别。

①②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页。

第二，论述了认识必然争取自由的条件和途径。

毛泽东认为，正确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掌握主动权，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民主革命时期，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① 1960年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回顾我们党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在谈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他说：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为什么认识必然、获得自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呢？我们知道，从必然到自由，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在这个飞跃中，人从客观必然性的奴隶变成了掌握客观必然性因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从盲目地参加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被动者，变成了自觉地改造世界的主动者。实现这一飞跃的基础是人们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实践。在实践中，人们逐步地认识客观规律，使物质变精神；在实践中，人们运用规律为自己创造条件，争得自由，使精神变物质。离开人的自觉的能动活动，就无法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毛泽东强调，科学在认识必然争取自由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9—240页。

由”。①就自由本身所包含的两部分内容讲，“世界的改造”是“必然的认识”的前提，“必然的认识”是“世界的改造”的结果。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对必然性认识的理论形态，它标志着人们已经获得的自由。同时，它又指导人们从事新的自觉的实践，探索新的规律，获得新的自由。因此，人们必须重视学习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除了强调学习社会科学外，还特别重视学习自然科学。195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②他要求各级领导奋发努力，成为既精通政治工作又精通经济工作的专家。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指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③毛泽东的这个论点十分可贵，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④1958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党工作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⑤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向毛泽东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

---

①转引自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②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375页。

③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9页。

⑤转引自《红旗》杂志1979年第1期。

时候，毛泽东谈到：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毛泽东上述一系列言论都表明，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必须学习科学知识。只有努力学习，积极探索，不断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才能把握客观规律，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毛泽东指出，认识必然，争取自由，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说：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①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为人们总结必然性的认识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失败的教训是走向正确和胜利的铺路石。因此，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都是实现必然向自由的飞跃所不可缺少的。1965年毛泽东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岗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中说：“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为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②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夺取革命的胜利，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准备由于盲目性而遭受挫折和失败，从实践中取得经验，认识它的客观规律，逐步取得自由。

第三，揭示了从必然到自由的辩证发展过程。

---

①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9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①这是因为，任何时代的人们在任何领域获得自由都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②因此，人们在一定时期的认识和实践所达到的自由总是有限的，对客观事物实现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③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我们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所经历的由必然到自由的飞跃过程，并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他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指出：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①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现成的经验，全靠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强调，就整个人类的认识来说，由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无限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②这是因为，整个物质世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的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③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自由和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因此，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内容。就我国情况来说，民主革命时期，必然就是民主革命的规律，自由就是掌握这个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由和必然的统一则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同时，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的发展过程。

---

①②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845、846页。

任何一个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的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由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范畴所组成的科学体系。由于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形态，因而论述的重点是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们虽然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运动的实质”，是“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但没有详细考察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重研究了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内部联系，提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①在中国，解释和发展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并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时，从根本上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1965年，毛泽东在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写了一个批注，从正面直接地、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集中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和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及范畴的关系。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是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①

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是不能并列的，对立统一是核心规律。这是因为：

第一，联系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总辩证，对立统一提供了理解联系和发展的钥匙。

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②而联系，实质上就是矛盾的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毛泽东批评在苏联一度流行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③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肯定了联系的普遍性，而且特别指明了普遍联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系的本质在于对立的统一。一切联系都是对立统一的表现，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离开了对立统一，既不可能有联系，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联系。

列宁说过，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①而“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②离开对立统一规律，就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过程和方向，也就是说，离开对立统一规律不能说明事物为什么发展和如何发展。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和展开，只有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下才能予以说明。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解释和说明质量互变规律。他认为，质与量是对立的统一，不能离开质去讲量，也不可以离开量去讲质，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量变和质变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③相对静止的状态就是量变，显著变动的状态就是质变。量变和质变都是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的相互斗争引起的。因此，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量变和质变的根据，离开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就得不到说明和解释。

毛泽东还用对立统一规律阐明否定之否定规律。他明确提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出肯定否定是对立的统一，说明否定之否定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是事物波浪式或螺旋式地发展，强调辩证的否定就是矛盾的转化。他说："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①这种曲折性是由矛盾斗争和事物发展所处的条件决定的。在矛盾双方斗争的过程中，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是不平衡的，条件也是不断变化的。当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时候，矛盾双方就不能转化，或只能部分地转化，这时事物就缓慢发展。当着条件具备，矛盾双方顺利实现转化，事物就前进、就发展。当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以后，又循着这样的规律运动和变化。这就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波浪起伏的状态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如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可能与现实等等，也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双方既互相排斥、互相否定，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离开对立统一规律，这些范畴就无法得到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他的贡献。但他有强调对立统一规律而否定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倾向。1965年，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说：恩格斯讲辩证法有三个范畴，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就不相信后两个范畴。又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这些说法，未免失之偏颇。

第三，对立统一规律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作为宇宙观，最根本的就是关于世界的矛盾观；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的规律，最根本的就是矛盾的规律；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方法，最根本的就是矛盾分析法。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即矛盾分析法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各个领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矛盾分析法研究物质微观世界，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光辉思想。

本世纪以来，随着高能物理学的发展，物质结构理论有了重大突破。人们认识到物质由电子、质子、中子等粒子组成，这些粒子被看作是组成各种物质的基本单位，因此被称为“基本”粒子。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基本”粒子是不是永远不变的、不能再分了的“物质始原”？人类是不是已经穷尽了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195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会上，谈到原子核内部的结构问题。他说：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①半年以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

①参见钱三强：《毛主席指引我们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光明日报》1977年9月18日。

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①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和科学工作者谈话，特别讲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刊登的日本坂田昌一的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毛泽东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院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②

毛泽东的讲话和他对坂田文章的重视，引起了理论界的注意。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重新翻译了坂田的文章，对文章作了注释，并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较长的按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②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页。

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发表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上。随后在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哲学探讨和自然辩证法具体研究的结合。

毛泽东强调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我国物理学家在“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指导下，于1965—1966年间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认为“基本”粒子是由物质更深一个层次的“层子”所组成。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了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说：“夸克和粒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① 这不只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而且表明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四、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在毛泽东以前，有人已经提出部分质变的思想。本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就提出：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并且要

①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6页。

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即部分质变。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使用了“部分的质变”的概念。毛泽东阅读过上述书籍，很重视“部分质变”的思想，有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或作了记号。

但是，上述学者关于“部分质变”的思想没有展开论述，此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毛泽东阐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它运用于革命实践。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讲部分质变问题，但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的论述，实际上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结合国内国际的革命实践，多次论及部分质变问题。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首先提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概念。他说：“我国在经济上的平衡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改成工业国，那时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①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并较全面地论述了“部分质变”及有关的原理。

毛泽东论述了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②这一段话科学地论述了量变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5页。

②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70页。

和质变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辩证过程，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简明扼要的概括。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运用大量实例，说明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拿蚕来说，在它一生的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飞蛾最后死了，旧质变成了新质（新下来的很多蚕子），这是质的飞跃。但是在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的变化，而是有部分质的变化。再以人为例，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亡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整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不断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在分析了大量的实例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要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如果没有大量的量变，没有部分的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到来。

毛泽东在论证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时，实际上也探讨了部分质变的形式问题。概括起来，部分质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指的是事物全局的性质未变而局部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他举例说：打倒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在这个量变过程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一部分一部分地推翻反动政权，一块一块地建立革命政权，这对全国来说，是量变过程。但从一个局部来说，是部分质变。正是通过这种部分质变的积累，最后实现全

国政权的质变。部分质变的另一种形式是阶段性部分质变，指的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举例说，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毛泽东在论述部分质变原理时，还提出一个“边”的新概念。他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事物的“边”和通常讲的“度”是一致的。边或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数量界限的范围以内，量变不会引起质变；超出这个范围，事物就会发生质变。在毛泽东看来，问题认识到此还不够，事物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边”。在边的范围内的变化，是同一阶段的量变，突破了边，就是部分质变，事物就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边”的概念是对“度”的概念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阐述的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说，它使哲学界沉寂了20多年的问题获得了新生。部分质变的原理虽然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没有引起哲学界的足够重视。毛泽东在60年代把它重新提出来，说明了它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根本质变和部分质变的区别，强调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质量互变规律。从实践上说，部分质变的原理批评了当时国内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凝固化，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这种错误的反映；另一种是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急于向共产

主义过渡，我国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就是这种错误的集中表现。部分质变的原理，就是针对实际生活中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但是，毛泽东在具体论述部分质变原理时，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所谓“把社会主义凝固化”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强调通过不断的“部分质变”来实现社会的根本质变，因而带有某些“左”倾思想的痕迹。

五、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发展

在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58年1月，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六十条中，工作方法占了主导地位。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又提出工作方法九条，后来又扩充为十六条，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又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1963年以后，他多次提出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总结工作，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所有这些，有的是过去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继承和总结，有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概括。其中毛泽东倡导的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主要是：

其一，一切经过试验

一切经过试验，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一切经过试验”，“突破一点可以推动全面”。

试验或试点，是一种探索性、尝试性的实践活动，当人们开始进行一项新的工作的时候，为了更有把握地把事情做好，防止出大错，往往先要试一试。如毛泽东所说，在农村推广试验田，在城市搞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等。经过试

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实践证明，这样做比较稳妥，可以避免失误，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切经过试验之所以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因为它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为了获得正确认识，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案，或者为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案，一开始总是选取较小的场所，如实验室、试验场、试验点等，在较短的时间里，使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反复试验，完成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一般到个别，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完整认识过程，从而总结出正确的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以便开展新的工作，打开新的局面。我们说一切经过试验，就是强调任何时候做任何工作都要试验。从个别到一般需要经过试验，从一般到个别也需要经过试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试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也要经过试验。

对试验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原则，不能有框框，不能以领导者的好恶和偏见来左右试验，而应当从试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试验是开创性的工作，需要解放思想。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人们不习惯，或者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就会遇到阻碍。所以要破除阻力，大胆支持群众的创造。试验既然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就难免走弯路，犯错误，只有经过反复试验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只要坚定信心，持之以恒，坚持试验、推广、再试验、再推广的方法，人们的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工作就会不断取得成功。

其二，两点论、两分法

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实际工作，提出两点论、两分法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① 他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分析和研究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十对矛盾。1963年底，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党内指示中，批评了"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的不良倾向，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②

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生动地运用"两分法"，研究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各种现象。物质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他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著名论断。反动势力是一分为二的，"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③ 我们党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3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页。

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① 我们的干部素质，包括红与专两个方面，“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② 毛泽东不但用两分法分析客观世界，而且用两分法分析自己，他曾对人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面对七千人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要求地方的同志转达下去，不要隐瞒。

毛泽东的“两分法”、“两点论”的基本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要对事物作全面的分析，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只讲一点，不讲两点，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第二，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在看到两点的同时，要把握其中的重点，分清主流和支流，否则就会陷入折中主义；第三，事物是发展的，不但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还要看到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把握矛盾双方转化的趋势，努力促使矛盾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第四，当矛盾向不利方向转化，错误倾向占优势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其三，抓两头，带中间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0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页。

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在社会生活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正如许多矛盾的存在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有中间环节一样，在先进和落后之间，也存在着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是受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所制约的。“抓两头，带中间”，正是根据矛盾的这种实际情况，遵循客观规律，推动矛盾的解决和事物发展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抓两头，带中间”是“比较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先进和落后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先进、落后、中间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如果闭目塞听，不和外界发生联系，不进行比较，就会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旦放开眼界，看看周围，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发现自己的不足，找到学习和竞争的对象。毛泽东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①先进、落后、中间都不能闭关自守，而要实行开放，在开放中比较、鉴别、竞争、发展。

“抓两头，带中间”，要求领导者如实地把先进、落后、中间三种状况揭示出来，加以宣传，让人们摆脱自我封闭的孤立状态，互相比较，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抓先进，就是表彰先进者的优秀事迹，总结经验，帮助后进。抓后进，就是研究后进者落后的原因，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解决实际困难，使之向先进转化。抓住两头，之所以能带动中间，是因为中间对先进来说是落后，对落后来说是先进，分别和先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进、落后构成矛盾。抓先进，树立榜样，对中间起着带头、鼓舞作用；抓落后，后进向先进转化，对中间起着借鉴和推动作用。事物的发展总是少数单位和个人走在前面，随后有愈来愈多的人赶上他们，而后又有新的先进典型出现，形成新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中前进的。

其四，留有余地

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错误，提出“留有余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留有余地，就是人们订计划、办事情，要量力而行，不能满打满算，一定要留有活动余地，留有机动力量。毛泽东说，工作要有机动。过去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战役上要多于敌人几倍兵力，不打无准备的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计划也应留有余地。长短计划，都应如此。文艺工作也是如此，戏要使观众看了以后有回味的余地。

留有余地的方法，是可能性和现实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我们的工作计划，如果是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制订出来的，那么它就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但是计划付诸实施前，它要达到的目标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由于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因而任何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可能性在转化为现实的道路上，都无法避免偶然事件的影响。它可能比较顺利地变为现实，也可能要经过较大的曲折才能变为现实。所以在订计划、办事情时，要留有余地，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留有余地的方法对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留有余

地，才能发挥上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说，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实际工作常常有这种情形，如果上级把计划订得很满，不留一点余地，下级觉得经过努力也达不到，就会泄气，最终计划也就完不成，甚至还会造成浮夸假报的坏作风。其次，留有余地，才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订计划时如果不留余地，只想到正常情况，不考虑可能发生的困难，只看到有利条件，看不到不利条件，那么一旦遇到意外的情况，就会陷入被动。毛泽东说："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①这样就能做到有备无患，应付自如，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此外，留有余地，才能保证工作重点。毛泽东说：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在经济建设中，留有余地，保持一定的机动和后备力量，才能在必要时候保证重点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至于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全面的发展。

其五，波浪式前进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前进。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这本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没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的一直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

事物的发展之所以表现为波浪式前进，是由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①事物的发展都是由于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和转化，即由量变到质变，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发展过程；从总的比较长的过程来看，都是曲折的，"之"字形的，螺旋式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认为，实行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要处理好进和退的关系。所谓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其中就有进和退、向上和向下的运动形式的不断互相转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总会有困难与曲折，应有必要的停顿、休整、退却、克服困难等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天天搞高潮，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可以高一些，有时可以低一些。也不能老是讲翻番，产量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产量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国民经济不能只发展不巩固，或者只巩固不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准备，来一个高潮、来一个跃进，生产就会大发展。到了一定时间又要稳定下来，甚至某些方面还要压缩一下。暂时的停顿、后退是事物前进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前进的准备。正如陈云说的："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②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②《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24页。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退却措施，从而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实行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的范例。

毛泽东强调，实行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要处理好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他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①平衡不平衡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波浪式的向前发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遵循这种规律，巩固和发展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对平衡状态，克服和改变那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的平衡状态，正确有效地处理和解决不平衡的各种矛盾问题，实现新的平衡。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是要不断解决不平衡的矛盾，不断建立新的平衡状态。毛泽东说：“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②

其六，交心通气

毛泽东针对党的群众路线遭到破坏、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力的情况，提出交心通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要“解除封锁线”，“与人通气”。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以真正的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

实行交心通气的方法，就要打掉官气，平等待人。毛泽东认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绝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耐心听完，认真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领导者如果以领导自居，高人一等，群众就敬而远之，不可能做到交心通气。

实行交心通气，领导者要诚心诚意检讨自己的错误，欢迎群众的批评。毛泽东说："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①只要接受群众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会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实行交心通气，要解除封锁线，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毛泽东指出，领导者作报告，要有观点，一种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那里的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封锁。如果不与人通气，问题不交给群众酝酿和讨论，就开不好会，办不好事情。

交心通气的方法，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对搞好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只有交心通气，才能正确决定问题，避免主观主义。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民主，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8页。

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①其次，只有交心通气，才能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再次，只有交心通气，才能使领导者和群众互相理解，增强团结。通过交心通气，群众批评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要求能得到及时反映；领导者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和实际困难及时告诉群众，消除他们的误解和不满，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这样，使领导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同心协力地建设社会主义。

上述种种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对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纠正“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十年建设时期在许多地方歪曲或违背了上述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关于“抓两头，带中间”，有时把先进、中间、落后等同于政治上的左、中、右，人为地制造阶级阵线与阶级斗争；关于“两分法”，在理论上，有时片面强调“分”，不讲“合”，在实践上往往只讲成绩，不讲错误，陷入一点论；关于“留有余地”，往往理论和实际脱离，高指标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关于“波浪式前进”，往往过分强调不平衡的绝对性，忽视平衡的积极作用。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第四节 主观主义错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

十年建设时期，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既表现在经济工作中，也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工作中。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经历了失误——纠正——再失误—再纠正的过程，直到1962年1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才初步得到纠正，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62年到1966年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观主义错误有所不同。就理论上说，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总的趋势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逐步升级，最后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就实践上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学术观点、文艺作品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批判，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特别是哲学战线上的两次大争论，也是十年建设时期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主观主义错误的重要表现。

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以及对不同观点的错误批判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从本世纪50年代起延续到80年代，是建国以后历时最长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涉及到认识论、辩证法等广阔领域，涉及到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经历了学术讨论——政治批判——学术讨论的曲折过程。

争论是50年代初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课堂教学开始的。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时，学员要求教师解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还是唯物主义命题，是黑格尔的语言还是恩格斯的语言。杨献珍和艾思奇在观点上发生严重分歧。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是黑格尔的语言；艾思奇则认为对这个命题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1958年1月，《哲学研究》发表了郭月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1959年10月，《光明日报》发表于世诚的文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原理吗？》，不同意郭文的基本观点。由此，争论在报刊上展开。1959年10月至1965年，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文章80多篇。由于当时掌握理论界领导权的康生、陈伯达的干扰破坏，把这一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因而使讨论中断。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否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双方的主要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还是可以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概括？它和反映论是不是根本对立的？

第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这两个“同一性”是不是属于同一范畴？思维和存在究竟有没有同一性？

毛泽东很关心这场争论，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

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毛泽东针对那种认为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同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的看法，指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毛泽东还从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上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指出：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观点。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提出并阐明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论断，再一次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

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不同理解，本来是一个学术性质的问题，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展开讨论，对于活跃学术空气，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裨益的。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政治上无限上纲，由于理论界受“左”的思想影响，使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杨献珍等人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状”，指责他们是“站

在反对毛泽东同志一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是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三面红旗提供理论武器”，“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的反映”等等。这种“左”倾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后果，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以及对不同观点的错误批判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是建国以来在辩证法理论方面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激烈的争论。

1964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杨献珍在给学员讲课时，谈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在此启发下，两位青年教师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1964年5月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由此在报刊上展开讨论。至1965年5月，全国报刊上发表讨论文章470多篇。讨论开始时，是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含义及其关系等学术问题进行的。其后不久，在康生、陈伯达的指使下，这场学术讨论转变成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1979年5月，哲学界重新开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至1980年10月，全国报刊共发表60余篇文章。

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从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理解来看，主要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可以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其理由是：首先，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表达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对立统一”的不同程度的认识。如宋代哲学家朱熹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明代思想家方以智说“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两种说法是不矛盾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在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时，都直接或近似地同时使用过“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提法。例如，列宁既讲“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一分为二），又讲“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二而一）。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并没有把两种说法对立起来。再次，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存在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互相渗透。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中的“一”，都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物；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中的“二”，都是指矛盾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的两个部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表达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意思。“合二而一”不是矛盾调和论。

第二种意见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相结合，才能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其理由是：首先，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即对立面的相互斗争；合二而一强调的是“合”，即对立面的互相联结，各体现了对立统一的一个方面、一种根本属性。因此，既要从同一中把握对立，坚持一分为二，又要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坚持合二而一，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对立统一规律。其次，从运动、发展的观点来看，“合二而一”是事物处于相对静止或量变阶段时的表述，一分为二是事物处于显著变动或质变状态的表述。因此，仅用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都不可能客观地说明事物发展的统一过程。

第三种意见认为，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科学而通俗的表述。其理由是：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是用“一分为二”的思想表述对立统一的。如马克思说的“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①，恩格斯说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②，都体现了一分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7页。

二的思想；列宁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更是直接地、明确地使用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其次，一分为二的本意，就是指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互相联系、互相排斥的两个对立面。它恰当地指明了辩证法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研究对象自身中的矛盾。它包括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内容，体现了矛盾双方既斗争又联结的关系，表明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以及事物由于内部矛盾并引起的无限发展过程。再次，世界上无“二”不成“一”，但并不是任何“二”都可以合成“一”，合二而一不是普遍的，而是有条件的。一分为二则不然，任何“一”都可以分为“二”，或者说任何“一”都包含“二”，这是普遍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同时，由于合二而一强调“合”，不能表达事物发展的自身力量，不能表达事物质变、转化、发展的趋势和前途，因而难以同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划清界限，不能用它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

第四种意见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不能代替对立统一规律。其理由是：首先，一分为二突出“分”，强调分化、分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难以具体说明对立面的互相联结和转化，因而只是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部分内容；合二而一突出“合”，强调矛盾的同一性，难以表达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的思想。可见，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只能说明在某种情况下矛盾的某种倾向、特征、趋势或结局，包含不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其次，列宁并没有单讲“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他还讲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识”。他把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概括为辩证法的核心时，一再申明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形象通俗地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及矛盾分析法，但他从来没有用一分为二代替对立统一规律这个科学的表述；他在谈到对立统一规律时，总是强调要深入研究这个规律的丰富的多方面的内容。再次，无论“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都不比“对立统一”更简略，用它们去代替“对立统一”，并没有把这个学说向前推进半步，而只能把辩证法十分丰富的内容弄得简单化。

从学术上开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对于深化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康生就出来干预，说这篇文章宣扬修正主义的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于是这场学术讨论很快就走向歧途，变成对主张“合二而一”观点的人的政治批判。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8月31日，康生、陈伯达主持草拟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以《红旗》报导员的名义在该刊第16期发表。这篇文章指责杨献珍“同党大唱对台戏”，以“合二而一”反对唯物辩证法，“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责与杨献珍观点“大同小异”者，都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这篇文章定下了对“合二而一”政治批判的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陈伯达等人又进一步把“合二而一”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使主张或基本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

人，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

从1966年至197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但是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这些错误我们认为都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理论学术界已有不少专文论列，本书不拟再展开论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除了严重错误的东西之外，也还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思想，还有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思想。当代国内外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晚年确有一些思想观点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在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认真地加以研究。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主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特别强调要教育青年，青年人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话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又如，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当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并且抓住这个问题，向党内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他还特别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以后，他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并

提出应采取的一系列的实际步骤，包括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他警告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现在看来，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我们应当对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并且懂得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又如，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他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新的历史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大造舆论，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丑化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夺权阴谋作准备。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也特别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而毛泽东却针对性地强调要注意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基本思想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以更好指导今天这方面的工作。

又如，关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思想财富。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一方面顶住了来自国外企图控制我国的任何压力，顶住了种种反华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毛泽东还说过：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气，有干劲。外国援

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毛泽东说的自力更生为主绝不等于闭关锁国，这是很清楚的。现在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要开放得更好。但是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和力争外援的辩证观点，他那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雄心壮志，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等等。

总之，毛泽东在晚年犯有错误，但他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指导我们进行国内外的现实斗争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第十四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中，由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高度积极性，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向前发展的。但是，由于客观上和主观上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犯“左”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新的失误，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徘徊的局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伟大转折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国家面临着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把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伟大的事业向我们提出了很

多新的课题，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去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走自己的道路，把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由于历史的转折、实践的推动、人民的努力和党的正确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统战、党建等各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很多新的哲学概括和具有哲学意义的总结，他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期间，党从根本上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作出了新的论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评价和新的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节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党一直为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斗争。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转折，党一方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一方面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正确开展思想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不但重新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且从多方面发展了实事求

是的思想。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倡导和制定的。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的基本思想特征，都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主观与客观分离，都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主观主义。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党内逐渐滋长了个人崇拜和主观主义，我们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生了脱离实际、违反国情的“左”的错误，后来竟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的原则更是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的践踏和破坏。毛泽东虽然先后批评过林彪的“天才论”和“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做过不少努力，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的许多工作都严重地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①

①《邓小平文选》第424页。

“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党内外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时，面临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彻底清查和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思想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一批有丰富经验和很高威望的老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等。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成了首要的迫切的任务，成了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严重地阻碍了党的事业。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形式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当时条件下坚持“两个凡是”，也就是意味着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阻碍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出来工作，阻碍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一句话，就是一切要按照“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很明显，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中国就不能前进。同样很明显，党的指导思想如果不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不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系统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把党的全部工作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是否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①他说：如果真的搞“两个凡是”，我们就会造成思想上的许多混乱，就会在很多问题上寸步难行。按照“两个凡是”，那我们就无法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按照“两个凡是”，那就不仅毛泽东做错了的事情不能纠正，而且很多毛泽东在世时还没有碰到的新问题更不能着手去解决，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②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和呼吁全党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邓小平的意见得到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两个凡是”既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评和抵制，也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对，逐渐提出了究竟以什么标准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问题。理论界和新闻界，早就酝酿对“两个凡是”进行批驳。当时，胡耀邦参与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在1977年12月的一次研究党校党史教学的座谈会上，他明确提出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随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改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经胡耀邦审阅定稿后，在1978年5月10日出刊的《理论

①《邓小平文选》第3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5—36页。

动态》第60期刊出，接着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和中央以及地方的其他报纸相继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道理。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热情欢迎、充分肯定；有的强烈反对，严厉斥责，反对者说这篇文章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主席”、是“砍旗”。

针对上述斥责，邓小平作了极其深刻的回答，他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他强调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②不久，解放军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篇文章，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标准的种种责难。邓小平旗帜鲜明的讲话和两篇著名文

①《邓小平文选》第10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14页。

章震动了全国，从此在全国迅速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次讨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大事，是一场坚持用实践标准还是用其他标准来检验真理的原则争论。这场讨论的核心是唯书、唯上，还是唯实；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领袖指示、经典著作、中央文件，还是社会实践。讨论的问题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却直接关系到用什么思想路线来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关系到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之后，能否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继续前进的问题。因此，这场讨论很快地越出了理论界的范围，形成为全国范围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从6月到11月，不但理论界发表了大批的文章，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而且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和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场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也冲破了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思想桎梏，掀起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完全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人民共和国近40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理论讨论在政治上产生了如此积极的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论证了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

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它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这就宣告了“两个凡是”的破产，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论战做了总结；这次全会也坚持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早已过时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端正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方向和基本路线；它还指出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都鲜明地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经过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真理标准的讨论，经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终于又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了。

二、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

在批判“两个凡是”和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斗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39页。

争中，在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党中央和邓小平不但忠实地继承和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且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从多方面阐述和发挥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主要的有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①又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②"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③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到新的理论高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坚持了"实事"即客观事物的第一性，人们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也坚持了辩证法，用联系、发展、全面、对立统一等观点和方法去如实地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点和规律性；实事求是还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求"就是去认识和探求事物的规律，它是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为指导的，其目的是要正确的认识和改造世界。实事求是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到这样的理论高度和这样重要的地

---

①《邓小平文选》第10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2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位，可以说，抓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981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首要方面，这说明我们党对实事求是有了比过去更高的也更深刻的认识。这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解，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全面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提出了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的科学论断。在为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邓小平针对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人们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特别强调和论述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解放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变化着的情况而发展；如果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人们的认识就必然脱离客观实际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一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他反复阐明，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①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僵死、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和主观主义偏见，为了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

①《邓小平文选》第323页。

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实际，从而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事物，则会使人们的思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可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邓小平根据实践经验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①必须解放思想，这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经过邓小平的深刻阐述，"解放思想"就成为同实事求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它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容。

第三，更明确、更完备地规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在1979年7月就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②1980年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③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是唯物论、辩证论、认识论三者一致性的集中概括，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也不能从书本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从人们的社会实践出发。这也就

①《邓小平文选》第132—13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7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是坚持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把党的思想路线立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我们在“求是”的能动的认识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认识既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密切地联系了实际，从而防止和克服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真正“求”出“是”来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的唯一标准和最后归宿。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检验“求”出来的“是”是否是真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求是”没有止境，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求”，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认识。实事求是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有利于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并且促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第四，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我们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而规定的政治路线，必须是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就不会产生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必须靠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凡属正确的政治路线，都是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定的；凡属错误的

政治路线，都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背离的。邓小平又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为什么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因为如果思想路线不对头，或“左”或右，不能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只能简单地照抄照转。这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无从胜利实现。因此，邓小平又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这是因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都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会大不一样。邓小平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联系在一起，深刻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又一科学总结，既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也充实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第五，阐明了贯彻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离不开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贯彻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革命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我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的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和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今天

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如实地反映中国的现实，抓住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会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线路，都会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轨道。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只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起来，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和促进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保证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真正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科学论断充分揭示了实事求是原则的无产阶级党性，它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认识。

第六，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要同建立和实行好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结合起来。邓小平提出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能保证做到实事求是，这是对于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 从党的历史上看，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和遭到破坏，由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不健全和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造成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现象盛行，因而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邓小平总结历史的教训，提出应当使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法律化、制度化。我们以往工作中发生的许多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由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

①《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特别是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使我们难于做到实事求是，制度不好，势必空气窒息，人们不敢实事求是地想问题和办事情，对于错误也难以抵制和纠正。邓小平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单单是个人问题，关键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实事求是必须要有群众路线作基础，民主集中制作保证。

第七，阐明了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极“左”思潮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邓小平总结拨乱反正的经验，针对着这两种错误思潮，提出了既要反对“两个凡是”，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③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胜利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搞“两个凡是”，搞教条主义，必然思想僵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则更谈不上实事求

①《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34页。

是，“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①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反对错误思想倾向也必须贯彻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②邓小平强调只有打下理论和实践的根底，才能真正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因此“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③而这个学习又必须密切联系革命实际，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④所有这些精辟的论点，都是对以往反倾向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这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各种思想障碍，牢牢地把握前进的方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作出新论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位问题。

---

①《邓小平文选》第242—24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3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3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37页。

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如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是什么？这是当时面临的和必须回答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二年间，党经历了反复曲折的道路，有深刻的和严重的经验教训。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斗争形势的科学估量又进一步作了肯定，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以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但是党在抓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问题上，走了曲折的道路，发生了失误，党的工作重心没有坚定不移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远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全会对国内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合乎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估量。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指

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指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①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三中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一方面，必须“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②可以说，三中全会真正开始了全面地坚决地依靠群众的拨乱反正，明确地坚定地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改革开放作为总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扭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5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6页。

转了“左”倾错误的方向。

二、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他说：“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

1979年6月召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主要矛盾问题是这样表述的：“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还说：“为了完成这个中心工作，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应该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②

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进一步强调提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

①《邓小平文选》第168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9页。

化建设。”①

接着，1979年9月，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总结了历史教训，围绕我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并且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对每个单位和个人“工作的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所作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②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又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③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

①《邓小平文选》第176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0、232、234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4页。

一；三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①

经过反复酝酿和思考，1981年6月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精确的完备的表述。《决议》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②这一概括既符合我国社会当前的实际，又比以往的提法更为精辟扼要，更为准确。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呢？这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从我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建国以来长期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其一，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看，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指出的：“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09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39、840页。

高劳动生产率。”①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我们在很长的时期内认识不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大力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二，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看，最根本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我国，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人民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但它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阶段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和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要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和在这个基础上改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

其三，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特征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生产力落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生产基础十分薄弱，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样，人民需要的日益增长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其四，从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地位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大量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人们之间物质利益的矛盾，城乡之间的问题，

---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5页。

教育文化问题，就业问题，思想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只有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解决。如果社会生产上不去，物质文化需要不能逐步满足，社会矛盾也势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办。

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以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因此，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这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的阶级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对于如何重新估量和正确处理目前时期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我们党也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周密地考察和研究了当前的实际情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结论，深化和发展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这些新的结论主要是：

第一，作为阶级的地主、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一次明确宣布：在我国（除台湾和香港、澳门外），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和教育，这些阶级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

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产生和存在都是经济的原因。阶级是指一定的社会集团，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来划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看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在我国，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随后又改造了小生产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用赎买的形式，逐步地改变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又使民族资本家和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地主、富农、资本家就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失去了剥削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经过近三十年的教育和斗争，我国不仅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卓有成效地把剥削阶级中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第二，我国目前时期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①

---

①《邓小平文选》第155页。

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比有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不同了。目前时期的阶级斗争对象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而是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严重犯罪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的新剥削分子、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分子等。他们已经失去了以往作为剥削阶级所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不可能形成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其次是阶级斗争的地位不同了。这种阶级斗争是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残余的阶级斗争，是"特殊形式的遗留"。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进行这种阶级斗争是为四化建设扫清道路，提供保证，是完全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再次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不同了。全国解放以前，剥削阶级占着优势，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夺取政权，阶级斗争的方式是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的对象仍然是完整的剥削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斗争的形式仍然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而目前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同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交错在一起，情况特别复杂，已经不需要也不应该再象过去那样开展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应当充分运用我们的国家机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正确有效地使用法律武器给予各种敌对分子以有力的打击。最后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不同了。在阶级社会中，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进行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斗争，随着经济上政治上的矛

盾的发展，这种斗争会越来越激化，直至采取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进行极为尖锐的生死搏斗，用以解决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由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对社会主义进行破坏的敌人已经不是完整的阶级，虽然这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将越来越缓和、减弱，直至最后消灭。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阶级斗争采取合乎实际情况的对策。

第三，我国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① "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科学估计。

所谓"一定范围"，主要是指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我国社会里占主导地位并规定和支配其他社会矛盾的矛盾，而是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的矛盾了；同时也指出阶级斗争不再是时时存在、事事存在、处处存在的普遍现象了，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比较，阶级斗争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在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社会矛盾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应当指出，"一定范围"并不是机械地指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它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客观情况是不断流动发展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会相应地流动变化，表现为时而缩小，时而扩张；有的地方缓和，有的地方紧张；有些领域减弱，有些领域激

①《邓小平文选》第168页。

烈，呈现出错综复杂、反复曲折的局面和过程，而总的趋势将逐渐走向缓和、减弱，直至最后消灭。但在某种条件下，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加紧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有时仍然相当激烈。

这种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我国为什么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对此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一，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存在，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将长期存在，它必然会对一些人发生作用。其二，我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某些反动分子还会采取各种方式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其三，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还会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对我国进行各种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特别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侵蚀进来。由于我们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种侵蚀和反侵蚀的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其四，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执政党的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新的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各种敌对分子的斗争也必然还是长期的。

第四，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多次武装颠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之后，就把战略重点转到和平演变上来，企图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不战而

胜”的目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在国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①

本来，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我们党早就反复阐述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什么又要提出和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长期"左"倾错误下，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有不少方面遭到了曲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是背叛和践踏了这些基本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了这些原则。但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对党中央所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理解，怀疑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少数人甚至攻击党中央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种从"左"的方面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必须进行批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挫折，党犯了错误，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兴风作浪，大肆散

---

①《邓小平文选》第150—151页。

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公然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致形成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人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还加以支持和鼓励。对于这种从右的方面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条件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提到立国之本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的高度，集中地加以阐述，并且对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充分证明了的，离开社会主义就会使中国历史倒退，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不错，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比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我们犯过错误，但我们还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发展得更快。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

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搞改革开放，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改革开放，而绝不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也越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决不可以放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多种因素，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虽然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有些人完全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有些人老是想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结论。在今天，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建设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可否认，党的领导有过偏差和失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借口党有错误而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绝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对于否定党的领导的种种错误言论，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都会变成一句空话。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思想保证。有极少数人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国内外阶级敌人知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解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当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强调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强调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强调要根据中

国国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能象过去那样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更不是僵化保守。一句话，就是要使我们立场更加坚定，方向更加明确，思想更加解放，更加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以后，邓小平还多次阐发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经常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种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搞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在四个坚持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而坚持党的领导又是四个坚持的核心。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要长期讲，整个现代化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任务。

四项基本原则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它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就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来说，是党和毛泽东早就反复阐述了的。但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四项内容概括成为“四项基本原则”，创造了一个有确定内涵的科学概念，从而把我们对中国

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既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又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对于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正确方向，不断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促进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实现我国人民的长远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着巨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发展，调整国民经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深入进行，迫切要求党必须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史作出科学的全面的总结，对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理论原则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明确的决议，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为实现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总任务而奋斗。正是根据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党抓紧进行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拟工作，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意见。叶剑英、陈云等也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决议稿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党内四千余名负责干部、五十余名老同志、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修改，集中了党内外的正确意见。党中央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开始起草到六中全会正式通过，

总共用了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这个文件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是以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回顾了党的六十年历史，科学地全面的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完整地准确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它的历史作用，并且在对历史做出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决议》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决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①

由于《决议》坚持了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对于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历史和重大问题，就能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恰如其分地分清是非，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决议》明确肯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同时也指出"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

①《邓小平文选》第256页。

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对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决议》首先充分肯定“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肯定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的同时，对于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以及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又进一步作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分析。《决议》明确指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同时又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努力，并且指出，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为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所作的一系列工作。《决议》明确地指出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反右倾”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指出“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决议》明确地指出八届十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有重大错误，指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决议》明确地指出“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过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决议》毫不含糊地、毫不隐晦地指出了这一系列的错误，对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同时又明确地肯定：“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

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从这些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从整体上讲，成绩确实是主要的，而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这十七年，邓小平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①这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分析党的历史作出的科学而公正的结论。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怎么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决议》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作了认真的批判，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指出这个理论一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二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

①《邓小平文选》第260页。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气以及组织等各个领域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总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理所当然、完全正确的。

但是，《决议》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恰如其分地肯定了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在十年内乱期间所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决议》论证了一系列重要事实后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决议》在讲了这些重要成就之后，立即明确指出：“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这样，《决议》就坚定明确地站在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的立场上，站在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既彻底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我们的党和广大人民在十年动乱期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邓小平在关于起草《决议》的意见中说：“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①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决议》对于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既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应当肯定的东西，也实事求是地否定了应当否定的东西。既不因为成就伟大而掩盖错误，也不因为错误严重而否定成绩。既着重分清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正确与错误，肯定三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主要的。又注意分清党的指导方针发生错误的不同情况，恰如其分地估计每次错误造成的危害，发生的影响。在肯定指导方针正确时，也指出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反对肯定一切；在批判指导方针发生全局性的错误时，也肯定一定范围内的正确工作，反对否定一切；在批判指导方针的错误时，并不否定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把党的指导方针的错误同人民群众的积极奋斗区别开来；在分析错误的时候，明确指出个人和

①《邓小平文选》第263页。

集体应负的责任，但着重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分析，弄清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和总结历史问题的典范。

二、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一开头就强调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① 毛泽东的一生，是同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领导我们党和人民达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现代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了雄伟壮丽的历史业绩。他在晚年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公正的、科学的评价，不只是关系到毛泽东个人，而且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不仅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注，而且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所关注。

《决议》坚定地站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运用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毛泽东的一生，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作出了历史所要求、人民所期望的科学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

①《邓小平文选》第255页。

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个评价符合实际，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待毛泽东的功过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对于历史、对于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我们如何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历史实践为基础的。在个人崇拜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鼓吹，把毛泽东加以神化，极大地损害了领袖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当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毛泽东晚年犯的严重错误被党认识以后，又有些人极力夸大毛泽东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决议》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反对各种错误的、荒谬的观点，不受各种偏激情绪和感情上的干扰，不带任何主观的成见，完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不仅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而且回顾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对毛泽东的一生，从他早期一直到他的晚年，对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都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概括。既充分地估价了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也恰如其分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活动。《决议》不只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而且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联系毛泽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来评价他的历史地位。这样，就使我们不是只看毛泽东的一时一事、一言一行，而是联系地、全面

地、历史地从整体上来评价毛泽东。《决议》不是形而上学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而是坚持两分法，既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勋，又如实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和批评了他所犯的错误。在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赫赫功绩时，也看到还确实存在着的缺点和偏差；在他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时，也看到他为党为人民做过的许多有益的工作和做出的贡献。

《决议》对毛泽东是非功过的评价，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否认革命领袖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既肯定领袖是一个集体，也不排斥在领袖集体中又有起核心作用的人物；既反对了那种把一切成就归功于领袖个人的错误观点，也反对把一切失误都归之于领袖个人、甚至只从领袖个人思想品质上找原因的错误观点。《决议》始终坚持把毛泽东的历史作用放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来评价，在充分肯定党的集体智慧、肯定其他领导人物功绩的同时，又突出了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决议》也始终没有离开党中央的整个领导集体去孤立地讲毛泽东的失误，绝不把党的挫折和失误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邓小平在对草起《决议》的意见中多次重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性质，《决议》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立场来看，革命者的悲剧，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暂时不能克服旧的势力，因而不能在现阶段实现自己的进步要求；一种是由于自身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在主观上缺乏经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生错误，离开了正确的轨道。在这两种情况下，革命者都会遭到挫折和失败，暂时形成丑压倒美的悲剧。毛泽东的失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失误，他的错误具有革命者的悲剧性。指出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很重要的。《决议》指出：“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有的人把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以此来否定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而《决议》对毛泽东所犯错误性质的分析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合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

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究竟根源何在，《决议》不是简单地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更不是归结到毛泽东个人的品质上，而是把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

且持续十年之久，既有“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就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来说，主要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毛泽东对此作出的一系列估计和论断，不符合我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但是，这些“左”的错误观点的发展每走一步，我们党都接受了它，并且把它作为毛泽东的新的理论贡献，反复进行宣传，影响极广极深，“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决议》没有停留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的分析上，而是进一步着重具体分析了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决议》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特点，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较清楚，但更多的问题尚有待于探索，而我们党又长期处于战争年代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我们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矛盾都缺乏经验，在马列著作中也找不着现成的答案。这些历史特点说明，如果我们不认真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谨慎从事，就很容易犯错误。

《决议》分析了我们党的领导思想，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新问题时，容易

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决议》特别分析了这样一种具体情况，就是领导思想上把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显得更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的误解和教条化，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因而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愈陷愈深。

《决议》还从国际环境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中苏论战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主观主义地担心堡垒从内部攻破，党内严重地产生了不应有的危机感，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决议》还从社会历史根源方面，深刻地分析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以至破坏，致使“文化大革命”能由毛泽东一人来发动并且持续十年之久。《决议》说：“党在面

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深刻地指出：“这种现象是逐步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决议》一方面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决议》所作的这些全面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深刻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要求。列宁指出：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我们从《决议》的分析中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多方面原因综合的产物，仅仅把它归之于毛泽东个人，甚至把它归之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全面阐述和新的概括

邓小平在关于起草《决议》的意见中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决议》科学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毛东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活的灵魂，以及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等，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阐述。这些阐述，是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新水平。

第一，《决议》完整地准确地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的上述表述，既恢复了"七大"和"七大"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解释，又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作了更为完备的阐述。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

用，又是它的发展，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既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又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和特色。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观点区别开来，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方面指出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又指明毛泽东是主要代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就切合实际地说明了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的集体作用和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总之，《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一个合乎实际的科学的解释，也是一个重大的拨乱反正，是三中全会以后，在新的高度上对党的指导思想所取得的统一认识和重要成果。

第二，《决议》扼要地、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决议》明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二十年代后期，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建党、建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进一步地对中

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完整地形成了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个方面的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失败转到胜利、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决议》用极简练的语言概述了我们党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历史，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在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何等的重要，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宝贵的历史经验。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决议》全面地、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概括和论述了六个方面，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对毛泽东思想包含哪些内容，还很少作过全面系统的论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批判了三次“左”倾错误，并且对照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但它还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全

部内容。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九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对毛泽东思想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概括。从“七大”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了很多新的发展，体系也更加完整了。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集中概括和系统阐述却作得很不够，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四人帮”大肆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造成了极大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为了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正确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作出明确的概括。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它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最完整的科学概括。

第四，《决议》第一次精辟地概括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是，《决议》第一次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实际上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初步思想。从那以后，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多次作过有关的论述，使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日益深化和完备。我们党的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此也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把上述三个基本思想概括起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决议》这样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概念，并精辟地把它的内容规范为三个基本方面，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决议》指出：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就是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还特别强调指出：这些立场、观点、方法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中，而且表现在他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决议》对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揭示了这些基本原则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决议》说：“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

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决议》说：“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

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决议》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

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决议》深刻地揭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内在联系。它们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三者都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从不同的方面，共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共同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如何科学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三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没有实事求是，脱离实际搞主观主义就根本不会有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运用，又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没有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不从本国实际出发，不依靠人民群众，也就不会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既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也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必然结论。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那就既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实际，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如果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不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一句话，不坚持独立自主，那就既丢掉了实事求是，也丢掉了群众路线。总

之，这三个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基本方面，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第五，《决议》科学地阐明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虽然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前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实践证明，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关键是要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那些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发展，主要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当前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根据新的实践或者概括出新的原理，或者充实和加深原有的原理，或者纠正一些过时的表述，等等。坚持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密不可分的。坚持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发展是坚持的过程和途径。只有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真正地坚持和发展。离开坚持谈发展，这种发展就会误入

歧途；离开发展谈坚持，这种坚持会变成僵化。邓小平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①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②

《决议》严肃地批评了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另一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两种态度都违背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四、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

《决议》指出："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

①《邓小平文选》第12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65—166页。

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最紧要最重大的课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已经提出了要探索解决这个课题的任务，并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错误地估量阶级斗争形势和没有坚定地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使这种探索在一个长时间里走了弯路。如何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健康发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才能逐步胜利实现。

《决议》正确地总结了三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结了十个主要点。《决议》对这十个主要点的概括极为简明扼要，其主要精神是：

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第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第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第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第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第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

第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第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

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上述十条是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这些主要点既深刻地反映了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密切结合，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从多方面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当然，这些主要点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第十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在科学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关于改革的理论也逐渐丰富起来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先后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又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的理论。党的十三大之后几年的实践，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所有这些，不仅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节　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和开创新局面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二大之后，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总结经验，在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所有这些，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精辟地概括了长期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毛泽东曾经阐述过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他强调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事物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认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

是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还是走自己的道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中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战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的国家转化成为现实。但是这些

---

①《邓小平文选》第371—372页。

国家究竟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独立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长期实践中，有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文化大革命"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到"文化大革命"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都要求认真研究自己的特点，正视自己的国情，探索自己的道路。为此，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复强调，不能照搬别国经验，一定要看到中国国情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

坚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为了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依据这个基本要求，遵循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深入地揭示和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

第一，战略目标与国情国力。

战略目标与国情国力的关系，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积极奋斗与量力而行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这是党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一个正确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

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但又是一个符合国情国力，具有实实在在的可行性的战略目标。只要我们积极奋斗，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国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脱离了国情与国力。这种经济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是极为有害的。现在的这个战略目标，从客观可能性和当前的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既看到了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又看到了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既体现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又体现了积极奋斗的精神；既反对了急于求成，也反对了消极等待。它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自觉能动性统一起来了。

第二，战略全局与战略重点。

为了胜利实现上述经济战略目标，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中央根据我国现状，通观全局，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科学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二大，要求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把这些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促进消费品生产的较快增长，带动整个工业和其他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要求国民经济部门在综合平衡基础上保持协调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为此又要求根据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确定战略重点，以更好地实现综合平衡，确保长时期内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建设才能健康

地、稳定地、持续地发展。因此，一定时期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对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能否正确地确定战略重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将决定经济建设事业的成败。

党中央以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为依据，运用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当作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完全正确的。

党中央指明了农业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要农业上去了，其他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特别是由于我国有十一亿人口，八亿农民，而农业这个基础还很薄弱，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不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没有起码的保证。

党中央强调指出：当前能源和交通的紧张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能源和交通运输是社会生产中的两个重要部门。同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较，它们是很薄弱的环节。把解决好交通能源问题当作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

党中央一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发展科学技术需要人才，强调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的发展基础在于教育。并且特别指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在正确地确立战略重点的基础上，必须按照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抓好重点，确保重点。同时，对于非重点也必须适当安排。对于地方、企业的需要也应当照顾，要进行统筹安排。这也是“全国一盘棋”的要求。陈云曾经指出：领导经济建设，我们要有一些这样的战略家，专

门考虑“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①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有效地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

第三，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

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指出：我们国家要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而这条新路子的核心就是提高经济效益，即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取得最多最好的生产成果。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却长期走了一条经济效益低、浪费大、消耗高的路子。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比较快，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这就使得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更加突出。要改变这种状况，逐步地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在战略指导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强调经济效益并不是否定必要的适当的发展速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辩证地统一起来。党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工农业生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33页。

产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是我们制订计划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处理经济效益与发展速度的矛盾时，一方面要反对只图高速度的虚名而不顾经济效益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不讲发展速度的倾向，一定要切实地把效益与速度辩证地结合起来。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社会生产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把经济增长速度订得过低，就会影响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满足。而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第四，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内在的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的经济效益很不理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的关系，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建立起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许多方面违背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从自然经济一下子跳跃进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其中必然要经历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的计划体制就应当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逐步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的相互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探索与实践中正在逐步地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①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历史经验。

党的十二大也提出要注意正确贯彻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针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二大报告还指出，既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否定或者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符合我国经济辩证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对我国改革和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进一步作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打破了历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的运用。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括，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必须建立能够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融为一体，为充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努力。把计划经济与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5页。

商品经济割裂和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

第五，公有制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而且极不平衡，既有一部分现代化的大生产，又有许多落后的小生产；既有相当比重的机械化、自动化的操作，又有大量的手工劳动。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加上管理水平的不同，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多种经济形式。同时，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劳动就业压力很大，生产建设和人民需要多种多样，需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为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产品和各种劳务，广开就业门路。总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也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公有制经济是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主要代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保证多种经济成份为社会主义服务，保证整个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是发展公有制经济绝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成份为条件。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不仅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应该积极扶持其他经济成份，并引导它们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而其他多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它们是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长期以来，我们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盲目推行纯而又纯的所有制形式和单一的经营方式，造成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许多严重弊端，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错误，放宽了政策，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僵化的经济模式，搞活了经济，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迅速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较快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使我国经济体制结构具有了新的活力，正在有力地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使我国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往的开放型经济。

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事物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并为我们党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建国以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处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封锁、禁运的方针；60年代初以来，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和我国的经济关系也大大缩小。另一方面，主要是我们受“左”的思想的支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自力更生方针受到严重的歪曲，使我国事实上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

粉碎“四人邦”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冲破了“左”的思想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的束缚，克服了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适时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来看待，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转变。

邓小平是实行这个转变的倡导者。他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又强调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又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①

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阐明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的关系。报告指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而且已经从国内交换扩展到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报告强调“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一切闭关自守、墨守陈规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一切单纯依赖外力、迷信外国的思想和行

---

①《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为也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①这个概括生动地体现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

总之，既实行对外开放，又坚持自力更生；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把外来的东西加以消化和发展。既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又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把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这样辩证地结合起来，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三、揭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就已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后，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多次提出我们要建设两个文明，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指出这两个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确认“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25页。

且把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更是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提到战略方针的高度，提到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对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全面的展开，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挥。

第一，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都具备着这三个基本方面的特征。社会主义也必须具备这三个基本方面的特征。如果只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而不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就不能全面地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

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认识到经济方面的特征，随后又揭示了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精神方面的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主要叙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特征，如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等。他们也谈到过社会主义的精神方面的特征，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

己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们将会有更多的余暇从事科学、文化、艺术等精神生产，因而使人的脑力和体力得到全面发展。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据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概括有新的发展。一方面特别强调发展大机器工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思想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复强调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新的劳动纪律，等等。列宁对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把思想、文化建设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毛泽东向来重视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又红又专，强调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等等。

总之，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方面的论述是很丰富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概括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也没有把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当作战略目标之一，更没有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在于它不但科学地提出和规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的高度。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引导我们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全面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

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关系。

十二大报告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文明。两个文明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当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并不是经常平衡的，不能说物质文明水平高，精神文明水平也必然高；物质文明水平低，精神文明水平也必然低。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这与社会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能够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过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必然阻碍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但是，如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论断是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社会制度与精神文明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深刻地指明了两个文明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的关系。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文明建设作为前提，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

展提供物质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推动着人们思想道德的进步，物质文明归根到底最终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和状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精神文明通过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强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艰苦创业，忘我奋斗，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对物质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两个文明的建设不仅互为条件，而且互为目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精神文明建设要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为目的，物质文明建设也要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精神生产既要创造社会的精神财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又要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提供条件和保证。物质生产既要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又要为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提供物质条件和手段。因此，两个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但互相促进，而且两者都以对方的需要互为目的。正是在这种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辩证发展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使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富裕幸福。

第三，论述了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不仅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而且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

一方面，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

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全国第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没有科学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进步。一般来说，愚昧无知是同不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树立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善恶美丑是非的明辩，离不开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十二大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在强调理想、道德、纪律的同时，强调文化，是完全正确的。要使我国人民在精神生活的各方面高度文明起来，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抓精神文明建设，要用很大气力来抓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思想建设又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着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整个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决定着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把思想建设看作是软任务，以为无足轻重，忽视思想建设，就会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失去理想，迷失方向，不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起来，而且整个四化大业也会走上邪路。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指出：“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十二大报告说：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

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尽一切努力，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特别突出地强调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针对着一些同志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优势，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认真做好，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四、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党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看作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把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任务。这是党总结三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建国以来，我们对民主政治的建设重视不够，是许多

错误产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就着重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个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党的十二大又一次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之一确定下来，并且进一步确定了民主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方针。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把高度民主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以往有一种理解，认为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种理解是有片面性的。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说，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确实是手段。但是，从人民群众奋斗的目标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又确实是目的。民主不但是人民群众在一定革命阶段上所要争取的目标，而且还是人民群众求得彻底解放的根本目标之一。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经过革命斗争建立自己政治上的统治，这个过程也就是争取民主的过程；在无产阶级夺取统治权的斗争中，民主就成了目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建设高度的民主仍然是奋斗的目的。因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利。必须看到，人民群

①《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不能认为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群众还要求享有社会主义宪法所确认和保证的各项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这本身也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就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完全，甚至不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

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同时，又强调了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建设同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这一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的深化。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就不能保证两个文明的建设，同样，没有两个文明的建设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它们之间也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保证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这就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最本质的要求，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党坚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党正是集中了人民

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把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上康庄大道。

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人民群众能够在管理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方面行使自己充分的权利，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时，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积极奋发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保证和支持两个文明建设走向胜利。

也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面临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我们的建设事业又是在世界还很不安宁、我国安全还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进行的。我们要创造和保持一个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社会环境，就必须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才能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最有效的专政，对各种破坏活动进行最有力的打击，使两个文明建设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当然，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和短期能够实现的，要有一个逐步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的过程。我国的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建设高度民主，不仅要有物质条件的逐步成熟，还要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条件。既要克服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和习惯，更要克服封建主义的反民主的思想和习惯。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有了充分的认识，在思想和行动上成为习惯，并且形成完善的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高度民主才有切实的保证。

五、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党既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又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关于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这在实践上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执政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理论上则使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

第一，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彻底唯物主义精神，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恢复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本来意义。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遗留问题作了正确处理，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在理论上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观点，断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党的十二大报告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样，我们党就不仅恢复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科学论断，而且把这一论断同社会主要矛盾直接联结在一起，把这一论断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第二，丰富和发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同时，通过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积累了在新的情况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首先，强调用疏导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对于人民内部大量存在的是非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不能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毛泽东把这个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是对长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民主的方法在解决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实践中真正取得更大的成效，我们党在新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疏导的方法。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对人民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我们要坚持疏导的方针，反对堵塞的方针；不能靠强制、压服和行政命令的办法，更不能靠戴政治帽子解决，基本的原则是教育、说服，基本的方法是疏导。

疏导的含意非常深刻。疏就是疏通，就是让人说话，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导就是引导，就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说服教育。疏导不限于谈心和批评，正面阐述、表扬为主、树立先进典型、落实政策和解决实际困难，等等，都可以算是疏导。疏导方法，就是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把疏通和引导辩证地结合起来。这个方法集中了我们党长期思想工作的经验，符合人们提高认识和转变思想的规律性，是既唯物又辩证的通情达理的思想工作方法。而与此相对立的堵塞的方法，不让人说话的方法，抓辫子、打棍子的方法，则是违背人们思想认识发展规律性的，是形而上学的，只能激化

而并不能解决矛盾。

疏导方法有多方面的要求，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这些要求主要是：

要求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以"领导就是服务"的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面对面地直接同群众"商量"，诚心诚意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有针对性地回答群众的疑问，宣传解释政策，同群众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沟通思想，交换意见。

要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行。既不上纲上线，又不放弃原则，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充满同志之间的革命感情。向群众坦率地提供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引导群众实事求是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要求领导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作出好的表率；还要善于发现和运用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带有时代特色的先进典型，现身说法，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道德的人讲道德，有纪律的人讲纪律，发挥榜样的力量。

要求具体分析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对群众的各种意见都要听。凡是意见正确、要求合理而又有条件办到的，要及时解决；要求合理而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一时难以办到的，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对错误的意见，不合理的要求，应当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不搞无原则迁就；有些思想问题，有些错误的认识和行为往往由实际问题所引起，实际问题如不解决，思想问题也难以解决，这就既要从实际出发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又要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际问题实际解决，这也是疏导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求耐心，不要过急，给人充分思考的时间和在反复实践

中提高认识。特别是在改革中，新问题层出不穷，形势错综复杂，出现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一时跟不上，都是很自然的。要耐心地进行讨论和研究，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党中央强调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几年时间，许多原来抱怀疑态度的同志都在事实的教育下转变过来。中央在指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耐心教育的方针，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今后一定要坚持这样做。

其次，重视用经济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过去对人民内部矛盾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好象人民内部矛盾只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认识问题。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讲了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讲了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相互之间，都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各种矛盾。刘少奇在1957年4月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也讲了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但是，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种简单化倾向，即对人民内部矛盾不加具体分析，一概当作思想问题，以为只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从而忽视了实际存在的人民内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使这些方面的矛盾越积越多，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发展，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和复杂化，这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心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落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对物质文

化的需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而也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形式的存在是对社会主义必要的补充，但是，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攀比，必然会引发多种多样的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由于人们在社会上使用生产资料方式、工作效益和分配方式的不同，所以不同个人在物质利益占有量上就不相同，物质利益矛盾也由此而生。由于在改革中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形成，都只能是逐步的，在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矛盾，并且产生一些不公平现象，产生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上摩擦。总的来说，物质利益矛盾是现阶段人民内部最突出的矛盾，其他人民内部矛盾都和物质利益矛盾密切相关。

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特点，我们党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把它置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体系的中心位置上。从根本上来说，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办法，都是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的。

人民物质利益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和暂时利益的矛盾，我们要尽可能照顾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协调发展。我们党坚持在维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统一起来，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的好方法，也是我国长期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又处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一些不公平或者说极不合理的现象，这些情况会激

化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对于这种情况，主要是通过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使各种经济措施配套和完备，逐步解决经济利益矛盾中的不公平问题。

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也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如果离开了正确的经济措施，政治思想教育就不会发生实效。归根到底，物质利益的矛盾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去解决。

再次，依靠法律和制度建设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国家不仅必须用法律对敌人实行专政，同时也要运用法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实现人民内部的民主，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现阶段，社会上不安定的因素甚多，只靠思想教育不行，只靠经济方法也不够，通过法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非常重要。对人民内部，如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总之，一切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都要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寻求一个好的机制，确立一种完善的制度，来协调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解决好各种内部矛盾。过去我们不重视法制建设，有过深刻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通过社会主义法制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把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把法制手段、经济方法、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才能更有效地得到解决。

第三，进一步阐述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经

说到用正确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但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党内矛盾并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他虽然从《矛盾论》起就指出党内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以后又一再指出这一点，但是他自己晚年却严重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党内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是极为艰巨、复杂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当前我们又正在进行改革，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社会各条战线要解决的矛盾很多，反映在我们党内也经常存在大量的矛盾。如何对待我们党内的矛盾，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大课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强有力地领导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如何对待党内矛盾的问题上，积累了很多新鲜经验，反映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中。胡耀邦在1986年7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问题》一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个重大课题。

首先，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上，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由于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另一种矛盾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我们党要求每个党员将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同时，只要有可能，党组织也应该关心和照顾党员的个人利益，使党员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的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但是有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干部党员却经不起这种考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有

些党员甚至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样把党内存在的大量矛盾划分为工作上认识上的矛盾以及个人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两种，是符合党内矛盾的实际状况的，其次，从矛盾的性质方面来看，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但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那就是：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只是思想上的保留，而且在工作中抵制；越出党的组织，散布同党中央对抗的主张和政策。这样就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也就是破坏了党的纪律。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说得上矛盾带有对抗性。至于党员个人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文章指出这是一个大界限。只有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这种分析和划分非常必要，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是我们在处理党内矛盾时必须加以坚持和严肃对待的。

再次，对于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应当认真吸取过去的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即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对于党内发生的同党对抗的矛盾，并不是说它们就是敌我矛盾，绝不能把对抗性矛盾同敌我矛盾等同起来。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

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这也就是邓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对于那些同党的宗旨、组织和纪律根本不相容的、对抗的人，如不改正，就不能留在党内。其中触犯国法的，还要依法处理。

正确地划分和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对于形成和发展“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对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胜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在改革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首先在农村全面展开，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接着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适应这个形势，我们党又进一步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着手制订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同时，适应着改革和开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全面改革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

一、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胜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精心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各方面的改革作过许多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在改革实践中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些论述是我们党进行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一，重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强调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肯定："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①

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了改革的思想，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状态"。②实现四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这就要求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求我们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

---

①《邓小平文选》第16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26页。

环节，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协调地向前发展，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协调地向前发展，而这就需要改革。邓小平后来又反复重申："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①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管理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们也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弊端，越来越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发展。1978年10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②这就把改革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制度改革的严重意义。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③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断，无可辩驳地说明进行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都充分说明，体制改革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千秋大业，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巩固和完善，也关系到四化大业的成败。

---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16—11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4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87页。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提出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同时，还提出改革要贯穿四化的整个过程。正是根据改革的思想，我们党确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这两项最根本的政策。实践已经证明，坚持改革，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已经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实践已经证明，改革是四化的保证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阐明改革也是革命，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出发，明确指出改革也是革命，科学地阐明了我国各方面体制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①他还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②按照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讲话的精神，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不仅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很深刻的革

①《邓小平文选》第125—12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51—352页。

命。邓小平说："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①改革也是革命的论点对于我们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做好思想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的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但从性质上来说，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具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②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进，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宗旨是达到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所以党中央和邓小平强调要彻底驳倒一些人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并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任何改革都不能偏离和动摇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必须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的性质决定改革的形式。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

---

①《邓小平文选》第142页。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21页。

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革命必然采取阶级对抗的形式。而在我国现阶段，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在改革中所遇到的矛盾，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改革不能采取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而必须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②我们的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亿万人民的自觉实践，采取正确的方法，坚决而有秩序、积极而又稳步地进行。

第三，坚持走自己的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总目标。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进行各项改革的总的目标。我们的一切改革是否正确，也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主要标尺。

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

---

①《邓小平文选》第29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96页。

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2页。

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他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包括总结中国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五年来，中国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我们搞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②

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经过调查研究，经过试验，不断总结经验，找到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好办法和好形式。“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我们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③

二、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哲学启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首先开始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5页。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65页。

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50页。

尽管农村问题仍然很多，不能估计得过于乐观，但是农村的总形势确实变得很好，农村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

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政策的综合结果，关键在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抓住了改革集体经济管理体制这个主要矛盾，把农村经济的全局搞活了。从1985年起，我国农村在成功地进行了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第一步改革的基础上，又迈开了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为中心的新的一步，我国农村经济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毫无疑问这是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进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村改革第一步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中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经验，这些基本经验不但对今后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从理论角度看，也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第一，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农村第一步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党的政策反映了农民的需要，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有了自主权，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了农民的首创精神。

八亿农民是我国农业生产实践的主体，离开了八亿农民的需要和利益，没有八亿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展农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得到了土地，他们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于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脱离了农民的需要、农民的利益，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使得农业生产发展迟缓。中国共产党的三中

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观点、群众感情、群众路线问题，和八亿农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逐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使劳动和经营的成果与农民的需要、利益紧密挂钩，不吃"大锅饭"，做到按劳分配；另一方面给予农民在劳动和经营上的自主权，不搞"大呼隆"，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这样就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了起来，开创了农业生产的新局面。

人们的劳动总是有目的的和自觉的。广大农民从事劳动也具有客观的、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动因，这就是为了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所以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它实现了生产劳动和人的需要的统一，使农民的劳动符合他们的需要、利益和目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联产"，就是由生产成果的大小来决定劳动报酬的多少，决定自身需要、利益的满足程度。在联产计酬责任制下，农民对切身利益的关心就直接转化成对劳动成果的关心，就转化成积极创造劳动成果的内在动力。广大农民深切感到"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在劳动过程中，他们的一犁一锄，一播一耘，莫不与切身利益相关。我们党理解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支持和引导他们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从而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在我们国家里，广大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要求切实保障经济上的物质利益，也要求切实保障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生产劳动中的自主性、独立性。人的需要既表现在物质方面，还表现在诸如自主独立地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等心理的、精神的方

面。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承包"，正是适应了现今生产力条件下广大农民的这种要求，给予了生产者在劳动和经营上的民主权利，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劳动责任感，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精心安排生产，改进生产条件，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使农业生产迅速改观。

坚持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十年动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中说："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心目中没有农民，不切实保障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就不能说有真正的群众观点，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和全局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大半也成了空话。"我们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刻地体现了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的恢复和发展。

新的农村改革的政策归根结底是亿万农民的实践，亿万农民的创造。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是广大群众摸索、创造，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不可抗拒地涌现，并经历淘汰、锤炼、演变、完善、推广的过程。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在最贫困的地区突破。因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大锅饭、瞎指挥的祸害最深，对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包产到户、大包干等，都是当地农民自己悄悄先搞起来的。当初一批农村干部冒着风险支持农民搞改革，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贫困地区的改革站住和坚持下来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明显了，于是中间地区、发达地区的改革也跟上来，推行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承包制，终于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所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党尊重广大农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认真地总结广大农民在改革中的实践经验，则有力地促进和加快了这一伟大的创造。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影响下，脱离农村实际，把集中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变成固定的模式，压制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确定一切农村政策的出发点。这就有力地鼓舞了广大农民和干部，为打破僵化的模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开辟了道路。

党中央在指导农村改革中，始终贯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决定就提出了要实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1980年，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再一次强调指出：“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地区，不同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农村第一步改革中有一个好的作法，就是尊重实际，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选择最适宜的经营形式，看不准的就不急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更不扣帽子和打棍子。凡是坚持这么做的，都比较好地能够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

党中央在指导农村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并且把实践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反复的实践和认识中来完善农村改革的政策，引导广大农民逐步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包产到组开始显示威力时，曾有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包产到组会动摇、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此一度争议很大。党中央总结了实践的经验，在1979年9月修改公布的农业问题决定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包产到组和联产计酬。这一决定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从实际出发，大胆实践，大胆创造，探索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经营管理方式，有力地促进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蓬勃发展，承包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实践的深入，证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比包产到组威力更大，收效更好。但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些人还指责“这是分田单干”，“复辟倒退”。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和邓小平认真倾听广大农民群众和实践的呼声，进一步总结了实践经验。邓小平在1980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①党中央在1980年9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群众自愿选择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从而使这种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方法简便的责任制形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社会上的阻力仍然存在，有些地方的领导和干部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认识不清，在行动上采取抵制或者撒手不管，改革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81年秋党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研究了实践

①《邓小平文选》第275页。

中的新情况，总结了实践中的新经验，起草了1982年1号文件，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强调所有制和责任制长期不变，强调责任制"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生产需要相适应，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有统有包。"这就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趋完善。近几年来，党中央在每年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经验，不断研究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而使农村改革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联产承包责任制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我们党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农村改革就比较好地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在改革中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比较好地符合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所以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第三，坚持改革，不怕困难，既要有坚定的信心，又要有清醒的头脑。改革的目的是要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因此不可能不遇到困难，不可能不经历曲折，不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求改革不出一点问题，那只是幻想，实质上是取消改革。要求改革得到所有的人赞成，那也是幻想。古今中外，没有一次改革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次改革没有遭到过不同的阻力。这是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必须既有清醒的头脑，又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不断排除干扰，不怕困难，才能把改革坚持下去。

我国农村改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的理论和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它不为传统观念和外来模式所束缚，不抄袭现成的答案。在这样一个八亿农民、幅员广阔、经济不发达、技

术基础薄弱、发展条件不平衡、经济信息不灵通的广大农村，进行这样一场十分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不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可能不发生缺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

根据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首先，要从本质上、主流上认清改革形势，对改革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看到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认清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不为任何困难所动摇，不为任何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所左右，也不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因素而怀疑和否定改革，一句话就是要坚持改革，把改革进行到底。

其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正视和处理好改革中出现的各种认识问题和具体问题。“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即使是不对的，也可以促使我们把事情考虑得更全面一些、更深入一些，因此必须认真听取，并择其善者而从之。”“至于不负责的闲言碎语，则可不加理睬。受闲言碎语左右，没有坚定的信心，屈服于不正确的议论，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是最危险的。”“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切实地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社会实践，开辟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用实践经验来教育干部，提高和统一干部的认识，把改革事业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同时必须看到，对新事物看不惯甚至抵制、压抑，一般都属于认识问题，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特别要允许干部保留不同认识，到实践中去受教育。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议论纷纷，党中央没有批判任何人，没有给任何人戴帽子，没有处分任何人，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相信在实践中会把认识统一起来。结果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转变

了思想，从不赞成到支持农村改革，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

再次，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改革必须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分阶段进行，不能求成过急。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才仅仅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刚刚开始，还远未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继续努力，深入进行。农村改革要达到的经济目标是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在近期还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生产经营体制和交换流通体制，建立农村能够调动社会经济内在活力、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机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还需要一面探索、一面实践、一面总结，不断前进。

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哲学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将近六年的酝酿和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决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具有政治意义和哲学意义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但创造性地发展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且其中也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认真领会这些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推进改革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紧紧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决定》中有一段非常精辟和特别重要的话："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的原因所引起的，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力量。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也绝不能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②当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③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论述，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不言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5?6页。

③引自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而喻，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向着共产主义胜利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生产力更是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我们至今仍然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的国家更是面临着一个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严重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曾经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1984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他还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 他还反复地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邓小平这些话既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对我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现在，仍然在妨碍我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原来的经济体制。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社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5—36页。

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有一系列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的具体制度与之互相适应。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确实存在着许多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致使经济体制缺乏生机和活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要求我们在改革中要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当作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决定》的这些论述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是从我们长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进行哲学思考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邓小平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①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突破不符合实际的一系列固定观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决定》中的一条主线；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是《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决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方面，从实际出发，敢于创新，不受任何老框框的束缚，突破了一系列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固定观念，在理论上为改革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哲学上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

②《邓小平文选》第123页。

各国无产阶级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只要社会主义实践在继续进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也就不应当结束。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和思想僵化、半僵化，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固定观念，因而也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能依据新的实践经验去进行再认识，以致长期禁锢着我们的思想。《决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以大胆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破除“观念崇拜”，鲜明地提出对许多理论问题进行再认识；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突破了那些陈旧的观念，依据新的实践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判断。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

《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必将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建国以来，我们依靠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

但是，过去长期流行着一种观念，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截然对立起来，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利用价值规律的种

种正确措施当成搞资本主义。我国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正是以这种传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结果就使得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弊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严重障碍。

《决定》依据长期实践经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和旧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就不可能设想四化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巩固。因此我们不仅要牢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应当理解“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我们热心于社会主义和四个现代化，就必须热心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其二，关于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的问题。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了增强企业的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决定》摒弃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点，确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新的突破。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区别，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只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完全由国家决策。这种管理体制一方面使国家机构陷于日常繁琐的事务之中，另一方面又把企业的

手脚死死捆住，使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

《决定》指出："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已经讲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①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所有权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经营权指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问题。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并不意味着必须由谁来直接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也要求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地分开。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资本家就逐步从直接经营管理的岗位上退下来，聘请经过专门训练的经理人员来进行经营管理，从而逐渐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来看，由于生产和经营的条件千差万别，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又经常变动，各企业生产的发展很不平衡，国家机关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种状况。如果由国家机关直接经营管理一切企业，正如《决定》所说，"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只有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从根本上打破企业附属于国家经济管理部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

门、毫无经营自主权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种种弊端，使企业放开搞活。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问题。

传统理论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是不相容的，把竞争当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竞争对社会主义经济不会起任何积极作用。《决定》在阐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这也是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这一论断是符合马列主义关于竞争是商品生产特征的论述的，正如列宁所说："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① 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竞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也必然存在。竞争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经济现象。

《决定》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

《决定》还阐明了开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样做"有利于打破阻碍生产发展的封锁和垄断，及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807页。

时暴露企业的缺点，促进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强调指出：“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各级有关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教育和管理，认真注意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只要加强指导和管理，让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领域的表现。社会主义的竞争是一种强大的动力，社会主义各企业之间既协作又竞争，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充满生机的辩证法则。

其四，关于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与部分先富问题。

长期以来，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分配上的这种平均主义，鼓励懒汉，挫伤先进，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已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重大政策打破了分配中“左”的思想枷锁，在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威力，《决定》总结了近几年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误解，从理论上批判了平均主义，进一步阐明了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与部分先富的问题。

《决定》指出：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是确认在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上“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由于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天赋不同，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等的不同，就决定了各个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不同，加上劳动者赡养家庭人口的差异，劳动者生活富裕程

度也自然会不同。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上述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就会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而率先富裕起来。这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

《决定》充分肯定了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决定》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必须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帮助他们致富，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些人所担心的两极分化。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只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的两极分化。

因此，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着，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在发展着。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也给了各种传统的落后观念以极大的冲击。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它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决不受任何过时的或不切实际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充满大胆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它对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进行

再认识的理论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对长期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哲学思考的结晶。特别是它敢于破除“观念崇拜”，敢于破除“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的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更是使人震聋发聩，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它不能不引导人们严肃地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我们判别是非的首要的价值标准？它又一次使我们深化了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以及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原则的理解。

第三，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各方面的认识，把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具体化。

《决定》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改革和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深入具体地进行研究，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其一、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别开来，具体分析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把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任务，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以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观点，并且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严格区分，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克服具体制度上的弊端，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强调指出：我国建国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

《决定》具体分析了这种模式的弊端，指出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毛泽东在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时，已经初步觉察到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了一些重要的阐述。但从总体上说，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阐述还是比较一般和笼统的。由于经验不足，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一些陈旧观念的束缚，特别是由于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其间多次着手解决，实行权力下放，但始终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决定》总结了长期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了精辟入里的具体分析，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把我们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二，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崭新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为我国计划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根据，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决定》总结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我们需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这种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考虑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改变，考虑到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计划体制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决定》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各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体制的改革，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决定》把价格体系的改革看成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就极其深刻地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必然要求的认识，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实际改革中应慎重地进行。

其三，运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建立企业内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决定》在总结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和城市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也

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是在生产关系领域改革管理方式、完善分配制度的一个重大步骤。

《决定》在肯定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后特别强调：在把农村经验运用于城市时，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考虑城市企业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农村的具体做法。既要坚持实行经济责任制，又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适合的形式，绝不能搞一刀切。

《决定》对进一步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和实行工资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原则，要求坚决克服企业与企业之间，职工同职工之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弊端。再次重申和阐明要允许一部分城市、一部分企业、一部分职工，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收入多而首先富裕起来，从而推动生产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在现阶段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个战略性措施，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也科学地阐明了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

其四，按照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状况建立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坚持从我国生产力比较落后又很不平衡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等实际情况出发，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必须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生产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

有制结构。

《决定》还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决定》所阐明的建立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四化的正确途径。它深化和具体化了如何正确处理我国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认识，以新的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其五，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起用一代新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善和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和保证。我国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是同从上到下党、政、企不分的政治体制，政府机构不能正确发挥管理经济的职能，以及不合理的干部制度分不开的。因此，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改革政治体制，正确解决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应经济基础和搞活经济需要的问题。

《决定》在第九条中还特别强调：“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邓小平说：“《决定》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①这个科学论断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的全面改革和四化建设都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决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关系到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要站在改革时代潮流的前列，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决定》指出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精心的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

《决定》还特别提醒全党：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

总之，《决定》从多方面为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改革、四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以及党的建设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等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具体化。它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1页。

四、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抓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从三中全会起，通过全党坚持不懈地努力，事实上已经做了不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

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① 此后，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发表了多次谈话，进一步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方向和目标、内容和关键、方法和步骤等多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是后来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它科学地说明了我国当前政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以及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规定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和途径，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第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弊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刻揭示了我国原来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3页。

现象、终身制现象、特权现象等主要弊端，对其具体表现、严重危害、形成原因作了分析，并着重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①

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都统管起来的一种过分集权的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当时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基本相适应。但是，随着和平建设的展开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和突出起来。邓小平在分析官僚主义现象时深刻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是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是，我们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

邓小平在全面分析政治体制各种弊端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们过去忽视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情况，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因此，要着重从制度上看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

①《邓小平文选》第28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了成功，随即把改革推向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得多。城市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开始讲“全面的改革”，讲改革将包括政治、社会、教育、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他特别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上来进一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①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经济要求政治为它服务。当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的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后，如果不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要求进一步增加企业活力，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求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需要出发，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要求理顺企业党政关系，切实实行厂长负责制；要求简政放权，减少管理层次；要求打破部门所有、条块分割，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要求改革计划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进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7页。

行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再一次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①

党中央强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质联系表明，民主政治要获得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其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必须有民主政治来保证，否则，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这就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

第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他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组织上造就大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②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它们更高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82页。

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它们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

邓小平提出的这些要求，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

1986年9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设计。

1986年11月，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说：“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又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是这三条，还是只有两条，或者还有第四条、第五条，现在我们正在研究。”①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个目标的确定，完全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实事求是，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承受能力，还兼顾了长远和近期两个方面，避免了只考虑长远而不顾及眼前，或者只顾及眼前而忽视长远的倾向。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来的。它以社会主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7页。

义民主政治为核心，充分体现了民主、法制、效率、活力的高度统一，为我们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美好前景。同时，我们把它叫做长远目标，也就估计到了实现这一前景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商品经济一样，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处于初建时期。长期的封建主义影响，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民主建设经验不足等各种因素，制约着我们在建设民主政治方面将要走一段很长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紧密地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实际，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同时又充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最迫切需要而制定的。这个目标将效率、活力、积极性作为主要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符合全国人民当前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保证改革能使全国人民受益，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这个目标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既抓住了政治体制的核心，又抓住了目前阻碍我国生产力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要害，是需要和可能的辩证结合，使人既感到方向明确，又感到脚踏实地，可以有效地防止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急躁和僵化这样两种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

总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一方面，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努力指明了方向，树立了一面旗帜，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使全党和广大人民在着手进行改革时，立足现实，充满信心，从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这样，我们就能够有秩序有步骤地去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实现近期目标为长远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可靠的基础。

第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他说，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邓小平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过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他说，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邓小平指出：机构必须改革，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等等。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我们的党政机构长期缺少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

邓小平还指出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他针对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

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随后，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着重讲了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的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民主。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做。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增强法制的问题，指出打击犯罪、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

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包括权力下放、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等等，是邓小平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的内容。

1986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后的谈话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①

党政适当分开是关键的论断，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多方面内容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造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种种弊端的主要因素。所谓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就是过分集中于各级党组织，实行党政适当分开也就是抓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0页。

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除了党政适当分开，还要同时进行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与党的领导制度密切相关。党政不适当分开，其他改革措施也将无从展开，党政适当分开确实是关键的一环。

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①党政适当分开的实质就是党政职能分开，从而使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其职能首先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是要在决定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总体目标上，在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提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全社会的行动，而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办理行政事务的办事员的地位。坚持以政治领导作为党的基本职能，既可以有效地防止以党代政，又可以提高党的领导地位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各项内容和措施，也就能够较为顺利而又平稳地逐步展开。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谈话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我们顺利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国情况办事。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都在搞改

---

①《邓小平文选》第300页。

革。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许多方法同你们不一样，这刚好说明你们是根据你们的条件来决定的，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条件来决定的。我们两国情况不一样，所以具体方法也不一样。”他特别强调了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①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中进行的，是对怎样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进行的一场伟大探索，既无现成经验借鉴，又无固有模式遵循，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立足点，在改革的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②

其次，要坚持兴利除弊，保持我们的特点和优势。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③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我们绝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而去搞什么“全盘西化”，或者自由化。“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④正确的做法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145页。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7页。

③同上第141页。

④同上第150页。

会主义民主政治。兴利，就是兴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优势之利；除弊，就是除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各种弊端。通过兴利除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趋成熟和完善，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再者，要处理好民主与安定的关系，保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邓小平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样，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步子迈得太急太快，或者有人滥用民主权利，甚至搞破坏国家法制的"大民主"，就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不能允许的。邓小平指出："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是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②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当牢牢记住这个"大道理"。

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指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人民就不会成为国家的主

---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2页。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0页。

③同上第151页。

人，我国社会生产力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发展。有些人不懂这个道理，以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早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已经阐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①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下去，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五、根据全面改革的要求，进一步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开展，改革、开放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更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党的十二大以及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并按照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

①《邓小平文选》第300—301页。

位，精辟地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决议》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所阐述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同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它通篇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很好的运用和发挥。

第一，总体布局、战略地位和基本指导方针。

《决议》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高瞻远瞩，通观全局，首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作了科学的、全面的概括，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个概括的明显特点是：中心明确，一切都围绕着经济建设，深刻地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内容全面，包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容，避免了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的片面性；改革突出，把改革贯穿于各个领域，把改革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诸多方面的内在联系，强调了中心与非中心之间、三大建设之间、建设与改革之间、各项改革之间，都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个"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的总体布局，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决议》提出："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这是认识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一个新高度，体现了唯物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认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也正是站在这个基本观点的高度，要求我们不能就精神文明来谈精神文明，而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局及其相互关系中来看待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决议》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同“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指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决议》还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同改革、开放以及它们带来的“历史性的重大考验”联系起来，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给社会主义带来强大活力，对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又进一步决定了它的基本指导方针。《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

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个基本指导方针凝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宝贵经验，体现了总体布局的思想。三个“必须”，鲜明地、坚定地、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要求和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抓住了三个“必须”，也就抓住了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要领。

第二，根本任务、基本方法和主要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作出明确的概括，越来越具有迫切的和深远的意义。《决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明确的概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对培养“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素质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

《决议》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的素质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提高人的素质的重大意义。《决议》说：“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十亿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的素质如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极大。特别是

全面改革、开放的加快和深化，现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更是迫切需要不断提高亿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就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统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概括。培养“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素质，既是现阶段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又是我们整个事业的长远目标。《决议》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培养“四有”新人，强调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确实是抓住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

《决议》接着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方法。《决议》再一次强调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指出以往的历史教训是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长时期内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决议》把主要矛盾问题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法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要牢记历史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在方法上，一是要坚持教育和疏导，对思想性质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说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一是要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归根到底，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

《决议》还针对着一些人把对外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要坚决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有益的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决议》还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主要特征，这就是“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概括脚踏实地，高瞻远瞩，放眼五洲四海，纵观古今未来，体现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体现了十亿中国人民的雄伟气概。它科学地、鲜明地、集中地表达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

第三，理想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决议》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党的最高理想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的关系，对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提出了不同要求，强调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提出在道德建设中要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决议》突出了理想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在论述理想建设时，提出了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这个概念。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强调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我国十亿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的精神武器。我们应该用这个“共同理想”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决议》还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是历史的必然，具有远见卓识，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前途的先进分子，组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建立共产党，就是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决议》高度重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同时又强调这个最高理想必须同中国各族人民现阶段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实现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在实现这个共同理想的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基于对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二者关系的辩证解决，《决议》强调指出了三个"一切"："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坚决克服长期造成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决议》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先进分子要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把共同理想同各行各业的发展目标、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同各自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建设，立志改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脚踏实地干事业。

《决议》对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辩证关系的正确论述，既

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离开现实斗争议论共产主义的空谈，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不讲理想、胸无大志、只顾眼前的盲目性。总之，就是要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通过现实斗争逐步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理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把理想和现实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道德建设同样有一个最高道德标准和现阶段道德要求的关系问题需要正确解决。《决议》在论述道德建设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基本观点指出："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

《决议》一方面强调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

体力行。”《决议》强调，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就为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而如果没有这种结合，道德建设就会在方向上同我们的现实斗争发生矛盾，要么企图超越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去提出过高的群众性的道德要求，要么不去有力地反对社会生活中损人利己、欺诈勒索等各种不道德的行为。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议》按照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的原则，分层次地对广大群众、先进分子以至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道德建设的不同要求，充分体现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对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论述，是对他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的深化和进一步发挥。

第四，民主法制、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决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文化的提高，把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上。

《决议》重申了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的越充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发扬的越充分，就越能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

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就是要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决议》指出，要用历史的观点，正确看待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所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对它们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给予充分的估计。应该看到，这些观念的提出，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民主和自由的口号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一直使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这些观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民主对资产阶级民主既批判地继承又有原则的区别，认清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我们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任务，对于我们加强民主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决议》再一次强调了“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纪律，同各种压制和破坏民主的行为作斗争，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推进并保证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顺利发展。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决议》特别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利益的，是广

大人民群众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草案时的讲话中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实际上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①因此，在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中，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应当旗帜鲜明，不能含糊。

《决议》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从小学开始，就进行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这应当成为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动摇的准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很重视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学明确规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这次《决议》进一步指出：“尤其是教育和科学，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但精神文明建设上不去，经济建设也将没有后劲。”《决议》通篇贯穿着把革命的理想、纪律、道德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统一起来的思想，通篇贯穿着要把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统一起来的思想。《决议》说：“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科学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决议》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3页。

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更加自觉地依靠科学，发扬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

《决议》在讲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时候，再一次重申了要尊重人才。一方面讲了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光荣艰巨的使命，应当认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我们各方面实际工作中仍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大课题。”《决议》说：“知识分子地位的真正提高和作用的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亲密团结和共同奋斗，是现代化建设必定成功的可靠保证。”

从历史上看，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的口号提出的，实质上也是作为精神文明提出来的。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提高到新的思想政治高度，置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里讲大众的也就是民主的。毛泽东把“科学的”、“民主的”当作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特征。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进一步展开，赋予了很多新的意义。应当说，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的丰富和发挥。

第五，马克思主义和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特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决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

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决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从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决议》针对着近几年理论界和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种种议论，着重阐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正确地指出："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决议》的这个基本观点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革命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的科学世界观，是彻底开放、不断发展着的真理体

系。它深深根植于社会实践之中，随着革命、建设和科学的实践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青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按照它本身的这个基本特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为了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议》针对着当前实际存在的问题，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是错误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而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也是错误的。前一种情况，多年来在我国理论教育和宣传中一直存在，至今尚未很好克服；后一种情况，近几年比较明显，在一部分青年中更为突出。注意克服这两种倾向，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很重要的。

为了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决议》特别强调了要坚决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现代化建设和进行全面改革是极其复杂的创新事业，在认识上、理论观点上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因此，必须坚决实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大胆探索、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要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学术和艺术问题，则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使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大趋势

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保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1987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反复再认识的积极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三大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斗争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正确判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何种阶段，是这一国家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最基本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有过不少经验教训。比如，1958年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失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的作法，曾经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反复再认识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讲到："在我国实现现

代化，必然要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他强调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它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应当加倍地爱护它，使它能在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优越性。

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在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针对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模糊认识，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提出的。但是，这个提法本身已经表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及其发展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历史决议着重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清算的过程，就是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系统地进行再认识的过程。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提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报告明确地把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这种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这种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

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这些分析已经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是随着全面改革的展开而逐渐深入的。改革进程中不断进行的讨论，推动着我们去研究国情，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改革推动了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块基石。虽然《决定》并没有直接写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它却从本质上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理由。

1986年9月28日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三次直接提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这些论述已经把党的现行政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这既表明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也为十三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十三大报告的准备过程中，全面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和讨论。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论述。

总之，党的十三大能够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与之相适应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积极成果的科学总结。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形成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个时代大趋势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使这个理论充分成熟和进一步完备起来。

二、革命发展问题上可以逾越和不可逾越的历史辩证法

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斗争中，科学地阐明了革命发展问题的辩证法，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哲学依据。他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采取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首先起来夺取政权，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或前提，然后利用这一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去追赶上别国人民的水平。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正是针

对这一问题，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科学论断。他甚至还具体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以上均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论我国革命》一文）列宁的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论述。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根据时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年间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同是否认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究竟什么可以逾越而什么又不可逾越的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深刻地全面地说明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辩证法。

为什么说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要摆脱深重的灾难和发展生产力，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历史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

至于为什么说我国不可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更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要实现这几个"化"，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算起，至少也要上百年。这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逾越它，那只能是一种空想。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不发达。判定这个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和长期性的客观依据，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这个初级阶段之所以不可逾越，首先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如果我们不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这个初级阶段之所以不可逾越，还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我们只能在这个历史基础上一步一步前进。

这个初级阶段之所以不可逾越，还因为生产力各因素的形成和发展只能日积月累，是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象革命和战争那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

迹。

这个初级阶段之所以不可逾越，还因为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无法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跨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去实现我们的最后战略目标。

党的十三大报告还科学地分析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现实情况，从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说明了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居于世界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十一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是靠手工工具搞饭吃；虽然有一部分现代化工业，但大部分是落后于现代化水平的工业；虽然有少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但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全国还有二、三亿人是文盲、半文盲；虽然有一部分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富裕一些，但大部分地区经济仍很不发达，人民刚刚摆脱贫困、初步解决温饱问题；虽然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总的来说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等等。生产力的落后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长期地艰苦奋斗，而不要盲目地试图去逾越这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之，事实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以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自然历史过程。这种既可逾越又不可逾越的辩证规律，是不发达国家各民族不能违反的。十三大报告从世界观的高度指出了产生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在我国

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这两种错误都同时或先后发生过。而建国以后的历史事实说明，在小生产、小农经济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的中国，很容易产生空想主义和平均主义，这种“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存在和影响，由于中国现实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始终存在着滋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土壤或条件。也正因如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左”倾空想论和右倾机械论都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制定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主要矛盾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解决了。之后，经过理论务虚会议的讨论，还有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已作出了精确的表述。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还把这一表述载入了党章总纲。而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明确肯定，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以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我们党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高度概括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于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曾反复地进行过阐述。党的十三大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地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深刻地说明了它们的根据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十三大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进一步指明：“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① 这是就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言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不仅远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也缺乏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大家知道，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远远

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5页。

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按人均国民总产值来说，也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这就是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还面临着摆脱贫穷和落后的艰巨任务。因此，在现阶段发展生产力具有特殊的迫切性，这就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最早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把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在三中全会预备会的讲话中，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邓小平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重大意义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1984年6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深刻论证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并把两者归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7月4日，他更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坚持两个基本点”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是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内容之一。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从根

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这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经验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认识上的深化，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三大重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基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现在要搞的现代化，当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能是别的现代化；如果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不要四项基本原则，那就离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要丧失团结全党全民奋斗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就要丧失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

十三大同时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唯有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在改革中前进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改革就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代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在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固步自封，不进行改革，闭关自守，不实行对外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健康发展。

党的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指出了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们就是在两者的结

合和统一中走过来的。以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党确定要走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采取过去的僵化模式，也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我们十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正确地搞好改革和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是党和国家内外政策的基础，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改革、开放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以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而不是要削弱这个基础。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当是坚持改革和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又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党制定的改革开放方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现实道路，从而也才能正确地、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今后要长期地做到四个坚持，最终说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少数人，从根本上说要靠我们搞好改革开放，扎扎实实地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四个坚持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所说的四个坚持是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四个坚持，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是以四个坚持为基础和方向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不

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相辅相成，互为存在条件，在运动机制上则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也就是说，两个基本点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隔绝的。因此，坚持两点论，两手抓，把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坚持“两个基本点”必须反对自由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关系，要求在实践中坚持两手抓，不可偏废。邓小平多次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抓精神文明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形形色色的腐朽的东西。实践证明，在对两个基本点本身的认识上，是存在着斗争的。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存在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用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的问题。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既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反对右的倾向。排除僵化和自由化的干扰，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战线的长期斗争任务，党的十三大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解是教条主义的，他们常常把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东西却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样，他们对改革开放中的很多新事物就往往采取否定态度。也曾有一些人用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

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改革开放就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就是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他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往往持否定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克服僵化和自由化的倾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克服僵化很不容易，由于“左”的错误长期存在，僵化的原则和模式形成了“习惯”，要克服它需要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教育。同样，克服自由化也必须长期进行，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尚未充分发挥之前，滋生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社会土壤将会长期存在。因此，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在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过程中，必须始终一贯地、坚定不移地排除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

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争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胜利

从1979年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过，有时甚至恶性泛滥，造成严重后果。这种思潮从理论学术问题入手，到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本主义和全盘西化；从对现实的否定开始，到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历史，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卖国主义；从散布言论、发表文章，到煽动学潮，搞反革命暴乱；等等。

十年来的斗争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共产

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质，就会走向灭亡。而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坚持。1989年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一个主要的国内根源就在于我们党的前任总书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不坚决、不得力，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给以纵容和支持，一味软弱退让，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就会被资本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和淡化。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际，特别是当前社会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针锋相对地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

应当说，在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一致强调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好的形势，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胜利，也不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掉以轻心。我们要不失时机地继续作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我们也要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

当前，我们仍然要在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

充、修正和提高。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赞成改革开放的；固守僵化观念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是在党内，认识上的偏差是会经常发生的。偏差和片面性的产生，说到底，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克服的根本办法，是引导大家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去分析和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在实践中学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一贯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同解放思想的要求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具有革命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的科学世界观，是彻底开放、不断发展着的真理体系，它明确宣布自己并没有包罗一切和结束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坚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本质特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它又发展它，才是真正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坚持和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又需要坚持，二者互相包含、互为条件。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基础和正确方向；如果只讲坚

持不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就适应不了发展着的实际，解决不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这样的坚持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这并不是真正的坚持。可见，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是坚持的需要和结果，把二者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才会生机勃勃。历史经验证明，那种把坚持与发展割裂开来，一讲坚持就搞“凡是”，搞教条主义，一讲发展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既有害于我们的事业，也不利于真正解放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1960年初，即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久，毛泽东在谈到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时曾经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国十一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植根于亿万群众之中的。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这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取之不尽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应当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面对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人类

文明的突飞猛进，面对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进一步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挥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影响，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为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党中央反复强调并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现在，一个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正在全国逐步兴起。伟大的实践一定会产生伟大的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里，生机勃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后 记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这部集体研究成果也奉献在读者面前了。从成书付印来说，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从公开出版来说，又产生了一种惶恐的心情，感到做了一件力不胜任、实际上又没有做好的事情。这种矛盾心态，是应当也需要向读者"交心"的。

对于一种学说，一种哲学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需要作史的研究，需要研究它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而才能避免主观性、片面性、抽象性，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评价。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当这样，要力求避免曾经发生过的绝对肯定，超脱历史的无限拔高的倾向，或绝对否定，不顾历史的、随意贬低的倾向，要如实地反映它在历史发展中的本来面貌。

历史是不能回避的。不仅因为它反映了过去的现实、前人的实践、时代的脚印，而且它总是以传统、经验、遗产、习惯等各种不同形式同现实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当今的世界各国愈是向现代化迈进，却愈要寻根问祖，愈要求助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从它的孕育一直到它的后继者在新时期作出新发展为止，其跨度也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了。如果说七十年的历史是不可回避的，那末人们要经常回到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来也是无可回避的。这就是我们执意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出发点和动因。

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却有着频繁的震荡和丰富的内容，而同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和起伏兴衰。遗憾的是，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同路人和见证人，还没有能够写出如此震荡、如此丰富的历史，还没有能够具体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开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而值得注意的倒是，不少外国学者和中国年青朋友却对此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把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文革”史、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史等等作为研究的热点，作为讨论的热门话题。或许有人以为，他们较少感情用事，较多严峻的目光，他们具有我们所没有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独具的有利条件，作为历史的过来人，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感受亲切，甚至命运与共，我们理应有所作为。问题在于对这段历史的畏难情绪和心有余悸成了我们有所作为的“拦路虎”。诚然，写当代人的历史，写当代人哲学思想的历史，评议其是非功过，总结其经验教训，确非易事，而在史料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在思想理论的概括和阐述上，其难度往往大于先前的历史，也更易招来各种非议、指责和风险。但是，困难正是科学的突破口，正是科学要逐一解决的难题，而恐惧正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正是科学精神要扫除的懦怯心态。可见，提倡和弘扬“五四”的科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研

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所必须坚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的这点“奉献”，总算是扫除懦怯心态、正视历史的产物，当然也是功力不济、难以解决无数难题的“初级产品”。事物的发展总是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才有“高级产品”，在简单粗糙的基础上才有丰富多彩，在描述历史的基础上才有历史的升华。这也是我们甘愿暴露自己的弱点，用以迎接批评，迎接未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丰收硕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土壤上生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确切地说，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把重点放在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上，不是那种理论性突出、思辨性也突出的“务虚”哲学，而是把重点放在对革命实践的研究和分析上，是实践性强、革命性也强的“务实”哲学；同时，这种哲学不是以某种重大发现和创造而命名的，也不是以某些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为代表的，而是以党和革命领袖成功地运用而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量地凝聚在党的文件、决议和重大方针政策之中的。因此，按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的特点来写它的历史，我们力求分析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从革命实践中说明它的贡献和作用，分析它的成败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展开我们的论述，力求把这种哲学思想更多地反映在政治活动和领导活动中，而不去过多地追求一般哲学的体系、学理性和思辨性。这种有别于一般哲学史的写法，确实反映了我们的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向理论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求教的心愿。

从本书的不少作者来看，可以说已经不是这一领域的“新兵”了，其中不少同志教学有年，研究有素，使我在合作中受益非浅，然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把这次任务作为一次“习作”

看待，作为一次"投石问路"的尝试。如果我们的弱点、不足以至错误，能够有助于在这块阵地上出现"百花盛开"的局面，那我们也就如愿以偿了。

本书编写的全部过程，从拟定提纲、讨论书稿、到统稿定稿，都是在全体作者团结协作、互相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位作者既完成了份内的工作，也承担了许多份外的工作。李克教授作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前任院长，在本书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离任履新以后，仍然抽空承担了第三卷的审稿工作；余品华研究员作为江西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负责人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组织工作和写稿、统稿工作；杨瑞森教授在完成自己的写稿、统稿工作后，还主动承担了第二卷、第三卷部分统稿工作，等等。可以说，全书的每一章节都渗透着全体作者的辛劳，它是一部名符其实的集体成果。在作者之外，许多同志对本书表现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参加了全部书稿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具体而中肯的意见；老一辈革命家、中顾委常委肖克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魏文煊、蒋佩明同志在成书的整个过程中，贯注了极大的热情和一字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江西省社科院许多领导同志对本书的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是我们完成任务的重要保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最后定稿的过程中，我还要由衷地感谢杨瑞森、余品华、唐元棣同志分别承担一、二、三卷的统稿任务，没有他们的亲密合作和艰辛劳动，我是难以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庄福龄

1991年5月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第３卷
作者＝
页数＝１０６５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十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热潮
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及其广泛影响
三、在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制定战略策略
四、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五、批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唯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阵地
第二节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贡献
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必然性和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
三、社会主义国有化和阶级消灭理论的新发展
第三节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
一、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著作
二、正确分析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提出解决矛盾的“兼顾两头”的原则
三、正确分析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提出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
四、正确分析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揭示社会主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特点
五、正确分析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发展内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
第四节　党的八大文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哲学思想
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二、“既积极又稳妥可靠”建设方针的辩证法思想
三、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四、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第十三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伟大贡献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著作

二、批判“无矛盾论”，阐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
四、第一次明确提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五、科学阐明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第二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破坏和党中央毛泽东对错误的反思
一、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
二、对主观主义错误的初步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
三、彭德怀、张闻天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四、倡导学习马列著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三节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四、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五、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发展
第四节 主观主义错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
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以及对不同观点的错误批判
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以及对不同观点的错误批判
第十四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一节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
第二节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作出新论断
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的阶级斗争
四、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第三节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决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二、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

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全面阐述和新的概括
四、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
第十五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一节　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
三、揭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四、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五、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二节　在改革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
一、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
二、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哲学启示
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哲学意义
四、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五、根据全面改革的要求，进一步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大趋势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二、革命发展问题上可以逾越和不可逾越的历史辩证法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
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争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胜利
后记